

中文摘要

位于四川省北部山区的广元市荣山镇板桥村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流信仰的村庄，信教人数达到了全村总人口的 98%。本文主要以观察法及访谈法等定性的方法，对这样一个宗教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探索村民信仰与社区和谐的关系。

结果表明：由于天主教的主流影响，该村基本形成了人的精神、道德层面的社区和谐；家庭、邻里等人际关系和谐；二百多年来该村没有犯罪现象；村民离婚率非常之低；教会形成了重视和普及识字教育的传统；国家政策、法规（如计划生育）在该地容易得到实施；宗族纷争在此没有表现；宗教信仰与一些中国传统节庆、仪式得以融合；一些传统陋习得以消除。天主教包含着显著的、可以导向和谐的内涵，如果引导得力，这种宗教可化为一种和谐的精神基础，对于净化慰藉心灵、和谐社区、稳定社会将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动力。

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和缺憾。如：村民是从小无条件地受洗并接受天主教教义的灌输和影响，这对人的自由发展和选择必然产生负面影响，使其形成一种安于现状、保守、依赖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另外，认为现世是一种苦修的理念相对削弱了教民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的积极性，与该村的经济落后有一定的相关。还有，村民在修建教堂时在物质和体力上的付出都远远大于他们对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最后，村民为亡灵念经大摆酒席所付出的大量人力及物力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这种消极面，尚需加以合理的引导。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教会及神父的号召下，利用教会的人才和资源网络进行人力及物力的资源整合，帮扶当地大力发展生产，加强科技文化教育的推广和普及；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改善当地信息闭塞和交通困难的状态。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药材、山货、林业等产业。并且建议教会更深入地教导教民，进一步改变乡村传统陋习；利用电视传媒手段促进村民提高文化生活质量。力求该社区在精神和谐的基础上，增加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思想先进、居住环境改善等其他方面的进步，得以真正达到方方面面的和谐。

关键词：宗教文化 传播 天主教 农村社区 和谐

Abstract

Rongshan Town Banqiao Village of Guangyuan City is a Catholic village which is located in North Sichu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uses observation (non-participate and participate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individual interview and group interview) etc. to research and gather the information of this religious village and discov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elief and the harmony of the community.

The result shows: because of the main influence of Catholic religion, the village has formed an ethical community harmon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ies and neighborhoods have a foundation of harmony.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built a tradition of educational popularization. The divorce rate is very low. Over 200 years, the village has no crime. The policies and laws are easy to be brought into effect. The strife between the clans is not represented here. The Catholic belief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s has helped eliminate some of the unwise local habits. With proper guidance, the religion can build a foundation of community spiritual harmony with socialism politics. It can become a dynamic power to impulse the social stability, democracy, community harmony within the village civi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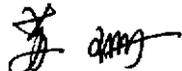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Catholic villagers are influenced by baptism at an early age. This could form a passive and dependent thinking and acting pattern. Also, the belief of living is suffering impairs the villagers' enthusiasm to pursue the happiness of this life and relates to the lag of the economy. Furthermor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material resources, the villagers had to choose to build the church first. This restricted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inally, the villagers invited many guests to pater the prayers for their dead parents and put a heavy economic burden on their shoulders. We should properly guide the villagers to walk out of the problems.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e article brought forth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Such as using the catholic man 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 network. This would to help the village to develop the production, extend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enforcing the basic construction (ESP. the roads). Also use the information transmits to reduce the problems of obstruction,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o develop the herbal and forest industrie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church to separate the Catholic religions and the local customs to help them to change the bad customs. By doing these, the Catholic village can develop an omni-directional harmony in this community.

Key words: theologic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Catholicism, Rural community, Harmony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中国农业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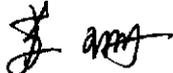
研究生签名：

时间： 2006 年 6 月 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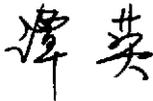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中国农业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中国农业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协议)

研究生签名：

时间： 2006 年 6 月 11 日

导师签名：

时间： 2006 年 6 月 11 日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1.1.1 研究的缘起

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的机会,笔者长途跋涉来到了广元市柴山镇板桥村,在年少的记忆里最令人难忘的是又累又饿的时候来到一位村民家请求搭伙,女主人热情地用土豆丝和老腊肉款待了我们,自己和家人却坐在门坎上用盐就米饭,执意不肯上桌,也坚决不收报酬。其家中贫穷,一望而知,后来我才知道腊肉是她家过节的时候才能享用的美食。那一天,我听说这里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民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据说这里很少发生口角,并且两百年来没有人犯罪。在村民的带领下,我来到了村里的天主教堂,看见古老的教堂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低矮的长木条凳,陈旧的四壁上挂着耶稣与圣母的一幅幅画像,简陋之中却透出一股肃穆庄严之气;据说两百年来几乎全体村民都信教。就在那一天,村民所表现出来的克己爱人和他们整个村落社区的人与人的和谐,个人内心世界的平和,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2004年我开始学习社会学,又适逢我国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村落的精神和谐状态又清晰地浮现出来,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是宗教的影响使该村呈现出人的内心的平和与整个社区的和谐吗?于是我决定再次前往该村进行实地调查。

1.1.2 研究目的

我国的农村社区有着自己的文化,乡村人民在多年来创造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它淳朴、厚实、勤劳、节俭,但同时又有着保守、愚昧和平均主义等弱点。由于农村中信教或准信教的人数极众,宗教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极大,在农村建设和谐社会与这种情况的关联度也就很大,宗教的正负功能甚至会影响到农村社区稳定、和谐的成败。因此,具体研究各种宗教在农村社区发展,特别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具体作用,应是必须的、迫切的课题。但是,这一研究,在我国很少开展。故笔者准备选择其中的天主教传播及其对农民精神状态、农村社区和谐的影响进行个案调查研究,从而融入宗教文化与农村社区和谐关系研究。

1.1.3 研究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忽视宗教

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诸多要素中,宗教是不容忽视的。宗教不仅是个人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而且由于其普及性,成为一种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非常现实的社会力量。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宗教,宗教形成后又反作用于社会,成为诸多社会控制因素中的一种。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因此,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在我国仍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就是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190-191页)。我国广大农民群体中,明确信仰某种宗教或泛神式地富于宗教情结的人,占有很大比例。因此,研究农民的宗教问题和农村的宗教传播,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在各种宗教中,目前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徒呈现出高增涨的趋势,近几年的圣诞节在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教堂内人员爆满的势头。根据三自教会统计,现有至少有1500万人信奉基督教,如果再加上信奉天主教的人数至少应该在2000万人以上。而本个案恰是一个“天主教”村,因此对其进行研究与剖析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对和谐社会的作用和研究价值

宗教是民族的甚至是人类的基础文化。究其实质,宗教是一种文化传播,并首先是一种信仰的传播。宗教,既是一种个人的思想信仰,又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文化现象,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在历史上曾经大力地推动过社会的文化、文明进步,极大地影响着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感情、道德、艺术乃至政治等各个方面,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佛教、道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社会历史价值。而在西方,可以说是基督教文化创造了近、现代西方世界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整合了西方传统文化,并进而影响着全世界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在中国,基督教传播已有1300年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1991,第114页)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入侵,西学东渐,基督教文化对我国近现代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方交流的加强,国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等受到该文化更深广的影响。江泽民曾经说过:“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225页)。这就是说,通过“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等”“文”的广泛传播去“教化”人的心灵,从而“为社会主义服务”凸现出宗教文化的现实意义。现在,宗教文化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很重要的是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本研究正是立足于“天主教”村,研究基督教文化对该村社区和谐的影响和作用,力求用研究的结果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1.2.1 关于宗教社会学

宗教社会学在国外已有百年历史,很多社会学、人类学家们对其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其中“功

能主义学派”以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帕森斯等为代表，从宗教的社会功能方面去认识和分析宗教，强调宗教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各种功能，并认为宗教具有维护和促进社会统一、和谐团结的作用；“进化论学派”以斯宾塞、E·泰勒、弗雷泽、罗伯特·贝拉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宗教是从巫术进化而来，并且将再由宗教进化到科学的；“现象学派”以阿尔弗雷德·舒兹、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勒克曼等为首，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考察宗教现象，并认为社会现实完全是人们在其主观意识支配下相互交往而创造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被创造出来之后，又反作用于人的交往；还有以韦伯为首的“韦伯学派”，认为宗教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他们着重研究宗教教义和信条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精神面貌并变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陈麟书，袁亚愚，1992，第13-19页）。

1.2.2 关于中国宗教的研究

荷兰汉学家德格如特（De Groot）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体系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实践内容（孙庆忠，2001）。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葛兰言（Marcel Granet）认为是中国的民间生产和生活产生和发展了中国的宗教及官方的文本传统，后者是前者的“模仿”（孙庆忠，2001）。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七十年代则得出了“存在一个中国宗教”的结论，他认为从中国的民间信仰和仪式的表面多样性形式的背后可以看出深层宗教秩序。（王铭铭，1996）。杨庆堃先生（C.K.Yang）的中国宗教观也认为“存在一个中国宗教”，他把中国宗教分成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家和社会团体是其依存之地。中国的宗教无法与世俗制度相分离，而只能被其所用，并对其加以反利用。（孙庆忠，2001）。

1.2.3 关于宗教功能和作用的研究

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主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评价宗教的社会功能，后来被归纳为“补偿论”、“结合论”和“世俗论”，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宗教也存在其正面的社会功能与作用。“补偿论”的观点认为：宗教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补偿”作用，它驱动着人类的行为，也联接着人类社会；“结合论”观点认为：宗教团结着整个社会，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结合的象征，把宗教视为社会存在的根本结合因素，具有构成社会标准价值体系的功能；“世俗论”则认为：通过对宗教与现代社会关系的研究，展示了宗教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态度和生产方式等，从而提出了因宗教价值观念及伦理观念的不同而导致社会结构及经济行为之不同的思想观点。这些宗教社会学的观点，客观评价了宗教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对于我们认识和评价我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功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http://www.buddhism.com.cn/zcfg/zcdw/zc3.htm> 中国佛教信息网）。举例来说，孔德与斯宾塞在认识和分析宗教的社会功能以后，肯定了宗教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涂尔干认为宗教有促进和维护群体团结与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马克思·韦伯认为作为思想文化现象的宗教，对世界历史进程起着重大作用，基督新教的教义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产生。（陈麟书，袁亚愚，1992，第13-19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宗教在对人类情感里，精神上，人格中的积极因素予以传统化、标准化、神圣化，从而既使个体心理得到满足，又使社会生活得以巩固，让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张志刚，2002）。拉德史利夫-布朗认为宗教仪式的存在是为了维持社会制度和巩固社会规范。英国历史学家道森认为人文主义的兴起的基本文化动因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宗教的，基督教为西方文明提供了最初精神动力，只有重新发现它，西方文明才

有希望得到复兴(张志刚, 2002, 第 119 页)。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一种文明形态就是其宗教的表达方式”, 西方文化的希望就在于基督精神的再生(张志刚, 2002, 第 127 页)。人们认识到宗教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作用有着独特的地位, 是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无法取代的。

国内外关于宗教功能的研究已经影响着我国的宗教政策, 使国家从把宗教仅仅当作“毒害人民的鸦片”转变为承认宗教也有促进社会道德、净化灵魂、慰藉心灵、影响文化、联系并教育群众、稳定社会等正面功能。一些国内现代学者也对宗教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作出了研究和评价, 其中, 王铭铭认为宗教具有社会控制功能和维护社会团结的功能, 张兴杰等人认为宗教具有安顿人心, 提供社会团结的功能, 但它也可能被人利用, 并且在社会转型期宗教的正负功能得到了强化。(张兴杰, 2004, 第 275 页)。尕藏才旦认为宗教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积极作用, 肯定了宗教的正面功能。(尕藏才旦, 2004)。来建础认为宗教能对人的心理起到慰藉作用,(来建础, 2003)。尚九玉认为宗教人生哲学中包含的某些积极思想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人生问题的解决(尚九玉, 2000, 第 230 页)。戴康生和彭耀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宗教的作用, 认为它既有正面功能, 也有负面功能,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戴康生、彭耀, 2000, 第 322-329 页)。

1.2.4 关于中国人信仰心理的研究

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 A. Schall Von Bell)等作过这方面研究, 他们认为在中国,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关键和基础, 中国人的信仰与自己的家庭、家族密不可分(顾卫民, 1996)。而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敬鬼神而远之”, 这句话影响着中国的人的信仰观, 使一些研究认为中国人无信仰或信仰冷淡(梁漱溟, 2005)。另外, 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人的信仰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求平安、求富贵、求健康, 认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契约性的, 是你做此, 则我做彼的一种方式, 是如果说你成全了我的心愿, 我就为你烧香还愿这样的一种心理。费孝通说过:“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 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 为的是免灾消祸。”梁家麟认为有很大一部分人信教是为了病得医治(梁家麟, 1999, 第 226、418 页)。侯杰、范丽珠也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有着极强的功利思想, 强调实际帮助(侯杰、范丽珠, 1994), 闭伟宁也认为这是教民信教的原因之一(闭伟宁, 2001)。而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署名为严行的人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 实用的精神, 每一声祈祷, 都包藏着个人私欲, 每上的一把香都燃烧着人间的愿望。”(<http://rjtdt.blogchina.com/4003944.html>, 《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功利、实用, 已成为一些学者们的共同认识。

1.2.5 关于新时期以来宗教在中国大陆复兴的原因的研究

关于新时期宗教在中国大陆复兴的原因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主要观点如下:

文化滞后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以建设物质文明为主, 以建设精神文明为辅, 在带领人民群众致富的同时, 没有及时注意人们的精神文明需要, 故造成了宗教的“乘虚而入”之势, 使得“物质文化”先于了“非物质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交通不便、文化生活贫乏、教育普及程度低等原因造成了人们产生宗教信仰, 以寻求一种精神寄托(闭伟宁, 2001, 宋清华, 2002), 需要对此进行有力的引导(赵卫东, 2004, 傅国钧, 2002)。

本土融合论：一些学者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陆复兴是在于她与中国的民间信仰进行了融合，而这种本土化又得益于中国人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结合在一起，根据中国人本身的宗教情感和需要，发展出一套民间宗教形式来（梁家麟，1999，箫志恬，1994，第73、164页，林春雨，2003，闭伟宁，2001，陆芸，2004）。而很多学者都同意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不得不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佛教与中国的民间信仰融合在一起而得以生存并发展的。

安全论：持这种认识的学者认为由于经济改革造成了人们生活的某种不稳定状态，国家在经济上不再采用计划经济而改为市场经济，而与此同时人们又缺少必要的社会保障，且一些地方上的国家干部并不能为民做主，人们渐渐失去了安全感，他们便转向了神佛，祈求保佑。（梁家麟，1999，宋清华，2002）。

满足论：当改革开放在增加人们收入的同时，也普遍提高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过去的闭关自守让人们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现在他们的眼界开扩了许多。当现实生活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期望时，他们在失望之余开始质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开始信仰神佛（姚米佳，王剑华等，2003，宋清华，2002）。

1.2.6 关于农村家庭家族的研究

国内学者王沪宁认为“村落家族文化作为远古形成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向社会方方面面放射它的核心精神，使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无不受到村落家族文化的核心精神的驱动”。他还认为，中国的家庭文化“没有形成普遍的朝夕相处的大家族，而是家庭文化的分家立户、相对聚居的家庭群体”，“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社会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中负责的成分，村子里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种种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他对族老社会地位的类型进行了专门分析，将族老的地位分为四种类型：荣誉型族老（因辈分和阅历而受到尊重，对族内事务有一定发言权，但没有实质权力）；仲裁型族老（拥有一定权势能对族内事务起调节作用）；决策型族老（拥有相当的实质性权力，享有较高的地位，对族内重大事务能作出决定）；主管型族老（拥有大部分实质性权力，享有最高的地位，不仅主管族内事务甚至有时也管理一些国家公共事务（王沪宁，1991）。吕红平认为家族的负面影响主要有六方面：1、影响社会稳定（家族之间的矛盾构成械斗，大家望族欺小凌弱）；2、危及农村组织（如向基层组织安排自己的“代理人”、与村级组织分庭抗礼甚至发生冲突等）；3、滋生落后意识（如抗拒殡葬改革、助长封建迷信、抵制生育计划等）；4、破坏法制管理（如公开阻挠政府执法）；5、抑制创新精神，（家族内部的归属感制约着人们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压制了人的个性解放，对农民的小而私的性格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影响）；6、增加农民负担（一是家族文化活动的摊派如修族谱、修祖坟等；二是家族赔偿费用的摊派，如家族组织械斗后的医疗费、赔偿金等；三是对家族内部弱势群体的救济摊派）。作者认为农村经济现代化、农村文化现代化、农村法制化管理及农村城镇化都能促进家族的消亡（吕红平，2001）。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内容与方法

2.1 理论基础

2.1.1 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将控制分为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外在控制是一种强制性控制，当一个人感觉到是外在的社会环境对其行为产生了约束和压力，使其不敢违反社会规范，那么这种控制就是外在控制。内在控制就是社会组织成员用内化的价值规范约束和指导自己行为的过程。这种控制方式使社会成员几乎感觉不到来自外部的压力，因为他高度认同了社会规范。内在控制基本上实现了自我控制，自觉、慎独、克己都是内在控制的形式。它是一个人高度社会化的结果。（王思斌，2004，第 275 页）本研究将分析宗教对个案的控制作用，研究宗教利用教规、制裁和舆论等外部控制手段来制约成员的行为，并将这些外在控制手段内化为约束成员的内在控制手段，达到对内部成员心灵和行为上的共同控制。

2.1.2 社会整合理论

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又称“社会一体化”，指社会不同因素和部分通过协调消除分离，达到融合统一的过程。社会整合可促使社会成员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加强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和功能互补。社会整合可分为文化整合、制度整合、规范整合、功能整合。（张兴杰，2004，第 320 页）该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首先提出，并由帕森斯继续发展。本研究将分析天主教对个案的社会整合功能。

2.1.3 结构功能主义的“显功能”与“潜功能”、“正功能”与“负功能”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墨顿提出了“显功能”与“潜功能”、“正功能”与“负功能”。其中“显功能”是指社会制度被人们认识到的具有主观意图的客观效果；“潜在功能”则是指社会制度所表现出来的人们没有认识到的、也没有主观意图的客观效果，它是一种客观的自发的力量，往往处在我们的认识范围和控制范围之外。比如，学校的显功能是传授知识，而潜功能是可以使青少年有事可做。（张兴杰，1994，264-265 页）墨顿还认为，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有功能，更不是任何时候都有正功能。有时候，有些因素实际上可能会破坏社会平衡，因而属于反功能。另外，有些因素在一个地方或方面是正功能，而在另一个方面则是负功能。（张兴杰，1994，第 24 页）本研究将分析宗教文化在个案中的“显功能”与“潜功能”、“正功能”与“负功能”的体现。

2.1.4 群体传播方式

巴维拉斯 (Bavelas) 和莱维特 (Leavitt) 研究了四种群体交流的样式：“环型”、“直线型”、“星型”、“Y 型”。对于每一种样式，巴维拉斯都测量出了其成员解决一个简单问题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以及对群体运作所持的满意度。巴维拉斯发现，Y 型是最有效率的，也就是说，这个类型能让成员在面对问题时用最短的时间解决。可是，他也发现环型模式却具有最高的士气。一个群体所生成的特定传播样式决定了何种传播渠道是开放的，何种传播渠道是封闭的，因此，群体网络影响着谁会对谁说话。与他人联系得很好的人则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在“所有渠道型”的网络里，任何群体的成员都可以和其他任何成员进行交流，这就给每个人以同等的释放影响的机会。群体网络同样还会影响士气。当人们与彼此的联系都被切断时候，个人的满意度就会下降。（美国，特里·甘布尔，迈克尔·甘布尔，2005，第 269 页）。本文将就宗教在个案中的群体传播方式进行具体分析。

2.1.5 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等人主张把依靠直接经验的学习（传统的学习理论）和依靠间接经验的学习（观察学习）综合起来以说明人类的学习。强调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不仅受直接经验的影响，而且也受间接经验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具有以下的特点：强调行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理论的焦点集中在个人为应付环境而习得的行为模式上；强调认知过程的重要性；强调观察学习，认为许多行为模式都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学来的；强调自我调节过程，某个特定的行为会产生外在的后果，也会产生自我评价的反应。

（摘自：<http://www.china1net.com/cinPsychology/XinLiBaiKe/detail.asp?ID=3220>。）

本文将以此对村民对天主教信仰的接纳和对天主教教义的学习及传承进行分析。

2.1.6 基本术语和概念界定

天主教 天主教是与东正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又被称为公教，来自希腊文 *kathalikos*，其意为普世的、大公的。其中心在罗马，以区别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所以被称为“罗马公教”。西罗马帝国于 476 年灭亡前后，罗马主教逐渐成为整个西派教会的领袖，并逐渐形成教皇体制。1054 年，东西两派终于正式分裂。东派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派自称公教，即天主教。天主教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并尊玛利亚为耶稣之母。天主教的《圣经》共 73 卷，其中《旧约》46 卷，《新约》27 卷。该教以梵蒂冈教廷为组织中心，以教皇为最高精神领袖，实行“圣统制”和“教阶制”。天主教堂中一般有圣母、耶稣、圣徒等塑像或画像。天主教中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必须独身。该教不主张信徒离婚并要求教徒在天主教瞻礼日（主要有复活节、圣诞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等）和星期日到教堂望弥撒。

弥撒 是教会祭献天主的大礼，其名来自拉丁文 *Massa* 的音译，又叫感恩祭，来源于新约圣经耶稣最后的晚餐，当时，耶稣为其十二个门徒举行了第一台弥撒，把祝圣了的饼、酒叫门徒

吃喝，并令门徒要这样做来纪念他。这是天主教会最重要、举行得最多的礼仪，并只能由神职人员主持，其目的是用圣体圣血祭献天主，向天主表示钦崇、感恩、祈求和赎罪，教会的主要信仰都围绕着弥撒进行，弥撒是天主教礼仪生活的主体与中心也是高峰。它以圣道礼仪和圣祭礼仪为主体。其基本仪式如下：

- (1) 进堂式： 1、进堂咏；2、致候词；3、忏悔礼；4、垂怜经；5、光荣颂； 6、集祷经；
- (2) 圣道礼仪： 1、读经（当天圣经）；2、讲道；3、信经；4、信友祷词；
- (3) 圣祭礼仪： 1、预备礼品；2、感恩经；3、领圣体；
- (4) 礼成式

天主十诫 天主十诫是天主教徒信奉的行为条例，根据《圣经》记载，是由天主在旧约中给以色列人下的诫命，共有十条，因此被称为天主十诫。前三诫建立人与天主的关系，后七诫建立人与人的关系，其总纲是全心、全意、全力爱天主，又为天主爱人如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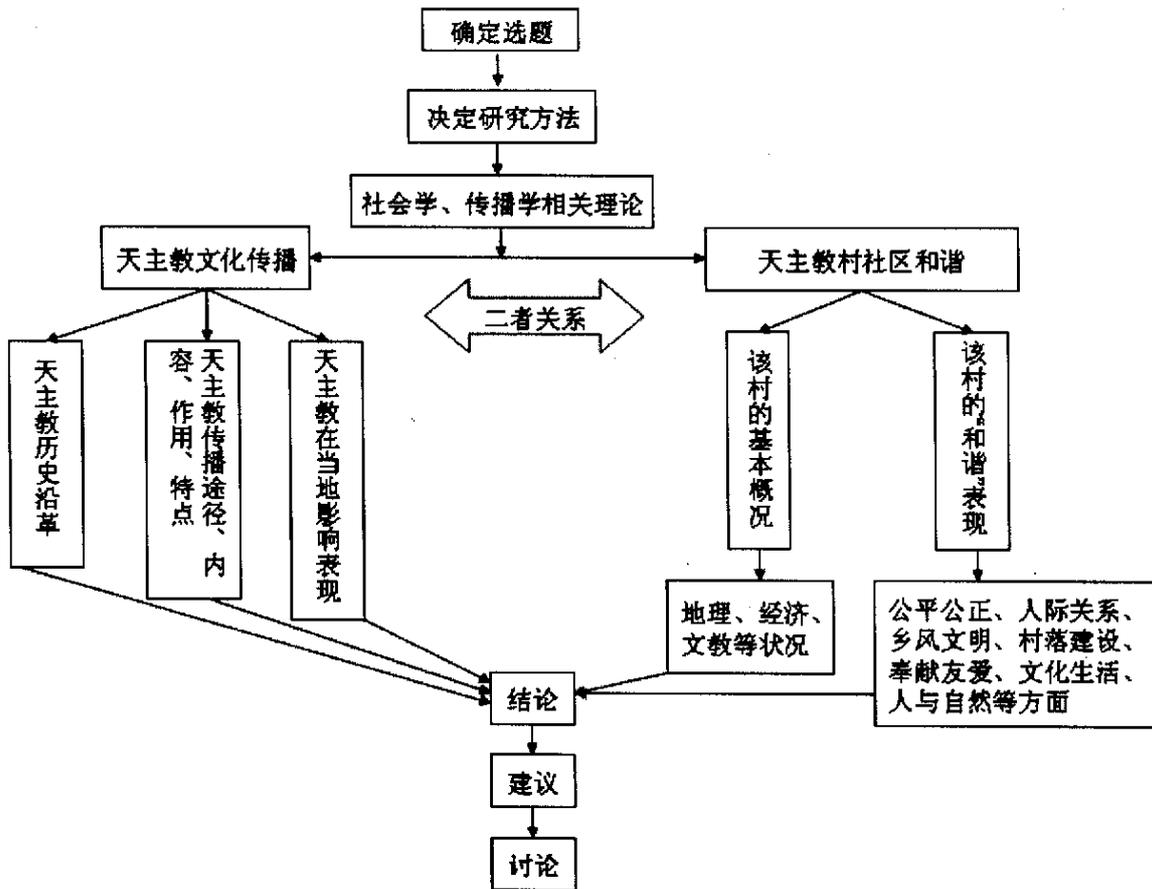
- (一) 钦崇天主在万有之上；
- (二) 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
- (三) 守瞻礼主日；
- (四) 孝敬父母；
- (五) 毋杀人；
- (六) 毋行邪淫；
- (七) 毋偷窃；
- (八) 毋妄证；
- (九) 毋愿他人妻；
- (十) 毋贪他人财物。

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是以地缘为纽带、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基本由同质性劳动人口组成的社会结构简单、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域社会。（程贵铭，1998）

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语）。

2.2 研究思路与实施步骤

研究思路：



研究的实施步骤

确定论文选题，撰写开题报告 根据自己的初步想法，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论文的选题，并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撰写开题报告。

文献查阅，进行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在查阅相关文献及资料的同时，计划出实地调查提纲，与当地协助调查人员联系。

实地调查 在当地协助人员的陪同下，前往广元天主教村进行实地调查。

分析调查结果 回到北京，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分析，以备写作需要。

论文的写作 正式写作论文。

2.3 研究内容

2.3.1 总体目标

本研究通过对川北“天主教村”这个二、三百年来世代村民共同拥有同一西方宗教信仰的典型个案的分析、解剖，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西方宗教传入、渗透该村的历史沿革和传播方式及特点，教民对“天主教”本身的认识和理念；考察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农村社区的影响是主宰式的还是潜在式的，了解其对该村农民思想、道德、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而探寻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力图针对结论得出相应的对策。

2.3.2 研究假设

天主教文化对中国农村社区和谐起着正向作用。

2.3.3 具体研究内容

- 2.3.3.1 该村的人口结构、家庭规模及教育情况；
- 2.3.3.2 天主教在该村传播的历史沿革、传播方式、内容及特点；
- 2.3.3.3 该村的宗教信仰仪式及宗教活动周期，宗教信仰对村民生活的具体影响；
- 2.3.3.4 该村的宗教权力结构及行政体系在该村的关系及表现特点；
- 2.3.3.5 村民道德、科技素养和精神状态及其与天主教的关系；
- 2.3.3.6 村民与外界的联系状况以及信息流对村民的影响；
- 2.3.3.7 “大跃进”、“文革”等运动对“天主教村”的影响。

2.3.3.8 天主教在该村的本土化问题（如中国传统节庆日与传统仪式在该村的表现及天主教教义在村庄的体现等）。

2.4 研究方法

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以定性研究为主

研究方法：实地研究

具体研究方法：由于调查内容难以定量，故笔者在该村居住近一个月，选取的居住点位于天主教堂边的神父院内，能密切接触信教群体，平时也常走访一些村民，基本以定性的方式进

行实地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等具体研究方法。

2.4.1 文献法

调查的过程中，在天主教村找到一些文献，其中有贴于神父院堂屋墙上的《教友公约》、贴于家家门上的天主教日历（标注天主教节庆日）；

在成都教区的教徒手中得到一些书籍，如《修和圣事》、《天主教教理》、《玫瑰经》、《慕之道》等。从中了解到“天主十诫”的内容及其延伸，“弥撒”的由来及仪式等与天主教徒相关的重要内容。

在广元天主教堂找到王良佐撰写的《天主教传入广元纪略》，得到天主教在天主教村的传播和影响的第一手资料。

2.4.2 个案访谈法

在所调查的村，走访了 35 个农户，比较注意找村里的典型户：如养殖户（养羊三十多只，村里的唯一养殖户）、村能人、低收入户、五保户，并注意年龄差异（老人）和性别差异（当家的妇女）。

2.4.3 知情人访谈法

主要调查了下列知情人：神父、村委会成员、村教会会长及会计、村医生、念经能手、教会义工等。

2.4.4 观察法

由于食宿基本上都在神父院，离天主教堂极近，又恰巧与成都教区的女教徒同住一室，故常有该村教徒前来探视，或在天主堂活动，极大地方便了笔者随时进行观察。并且，笔者有目的、有选择地参加了弥撒、赠礼、个别家庭的周年祭活动等，在观察的过程中既有参与式观察，又有非参与式观察。

第三章 调查地区宗教文化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3.1 四川省广元市荣山镇板桥村的基本概况

3.1.1 地理状态

本项研究的个案是四川省广元市荣山镇板桥村。广元市位于四川省北部与陕西、甘肃交界之处的大巴山腹地，北接秦岭，南连大剑山，崇山峻岭，连绵环绕。古时曾有歌谣喻其境内的川陕通道处的明月峡：“天险明月峡，断壁高接天；飞鸟飞难过，猴子锁眉尖；低头望山谷，白云脚下悬。”广元市一带的地势之险要，交通之艰难，于此可见。所以，自古被称为“难于上青天”。川陕公路和宝成铁路从市境南北穿越，广元成为“川陕锁钥”。个案板桥村属于市中区管辖，广元市市中区位于嘉陵江的上游，它的四面东为旺苍县，西为青川县，南为剑阁县，北为广元市朝天区。面积 1492.55 平方公里，该区下辖包括荣山在内的 7 镇、3 乡，42.3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9.71 万人，占总人口的 45.5%。广元市荣山镇板桥村（为突出个案，以下称天主教村），坐落在距市中区东北方约 40 多公里的大山中，地形呈“簸箕状”，仅有一条机耕道似的公路蜿蜒通向 16 公里外的荣山镇，属于典型的内向型村庄。这样的地理环境，使该村与外界交流相对困难，住处与经济比较封闭落后，对于宗教传播来说，初起之难，可以想见；但在形成规模和影响后，也会因其闭塞，不易受到其他干扰或诱惑而分散、转移，有利于村落宗教化形成定势。

3.1.2 人口状态、人员流动与对外联系状况

天主教村人口情况：天主教村共有 190 户人家，总人口为 735 人（这一数字以 2005 年 7 月为限）。村落为五个姓氏的主姓村，这五大姓氏为：薛、杨、李、周、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其他姓氏。大龄单身汉有二人（均为七十岁以上的孤寡老人、五保户、男性：李某，76 岁、周某，71 岁）。村小教师二人（只到小学三年级），退休教师一人，校长一人，李某。党员二十人。村委会三人，支书李某，村主任周某，妇女主任李某。天主教会会长二人，正会长李某，副会长冉某，会计一人，周某。

本村的人员流动主要由参军、考学和打工形成：

参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村民薛某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沈阳军区后勤部工作四十余年，成为部队的干部，他于 2004 年退休，并在沈阳定居，他曾帮助好几个他在板桥村的侄子前去沈阳参军。1959 年现村委书记李某去西安参军，复员后回到地方，先任和平大队书记、现为板桥村书记。村天主教会冉副会长的大儿子复员后在镇上工作，现为荣山镇的镇长。以上几位都是在水平流动的基础上得到了垂直流动的结果。从五十年代至今参军的人有二十七名，大部分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九人在外面发展，其余的人回来后思想都比较开化和进步，从经济上来看也是村子里比较富裕的。

考学：民国时期薛某加入共产党，进入过黄埔军校学习，据说还向村民展示过与周总理的合影，后成为国家干部，在外居住，不常回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某于武汉水利学院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基本上没再回来。李某，九十年代初中毕业后对分配的工作不满，辞职去深圳打工，现在一家公司任白领，每月工资近三千元，今年在广元给父母买了房，其父为本村小学校长，听说今年退休后会携妻迁居广元。2005年周某从江油师范考取成都师范专科学校在外共读书五年，现在成都实习，基本意向是留在成都。本村从民国时期到解放后考学成功的人不多，以上是访谈得到的结果，听说这之前也有考出去做官的，但都是一些碎片，无法归纳。

外出打工：村子里有60%-70%的人口都外出打过工，现在在外打工的人数约为全村人口的50%，打工的目的地主要有新疆、西安、天津、河南等。村主任，因会一些木匠活后组织了个小装修队在外给人装修，基本不回村，在荣山镇买房以后，全家都在荣山镇居住，其工作基本由村委书记代理。前面提到的冉会长的二儿子在镇上开20吨的大车跑运输。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村民在挣钱或工作发生变动以后就住在外（如荣山和广元等）买房，然后将父母、妻儿都迁出本村，但外出定居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大。

村民的对外联系：

1、 与其他教友、教堂和教区的联系：

近处的几个村甚至乡里有人受该村的影响也信奉了天主教，如柳桥、荣山煤矿劳教一大队、三大队处村民、庙子山等地的村民会到这边教堂聚会，教友也到邻近村的教友家串门。本村的村民如去广元赶集大多都到广元教堂去，吃饭和晚上住宿也可以在该处解决，相邻的旺苍教堂也有人会去。另外广元教会去年派了两位会长去成都教会学习了一次，共七八天时间。而成都、西安、旺苍、北京等教区的神父、修女、修士和教友也会亲自前来本村或以电话等方式进行联系，也时常对本村的教会或教友有一些捐助行为，这样，就在无意中形成了以教堂为地理中心、以信仰为根本理由的人际网络。这种联系，是村民特别是老弱妇孺获取精神、文化信息传播的主要来源，可以算是一种企盼。

2、 村干部外出开会

村干部由政府组织每一到两年出去旅游、开会，访谈中李书记就自豪地谈到了自己参加今红色旅游一事。但能够参加的人员和次数都太少，信息传播和接受的作用较弱。

3、 赶集和进城（包括打工）

由于人力摩托车的雇用比较方便和便宜，使得村民赶集的频率加大，人数增多，当然仍然有不少人选择走路，他们基本都能健步如飞，令笔者自愧不如。他们大多时候会下山进行一些买卖活动，如收一些核桃、板栗、木耳等山货或土鸡（即柴鸡）和鸡蛋带去集市，再买回一些日用品。在距本村最近的和平乡场上有一间小卖部，经营着还算比较齐全的日用百货及食品。村民常去的集镇从上往山下走，一路有和平乡集镇、二重岩集镇、荣山镇集镇、元坝镇集镇、柳桥乡集镇以及广元市内的多个市场。但赶集的目的是经济的，直接获取科技、文化信息的机率并不大。与此同时前面也有提到本村外出打工者比例大，人数多，青壮年甚至包括老年人都有外出打工的。这使得该村的村民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范围也广得多了。

4、 政府组织的帮扶活动也使该村与外界发生联系

广元市中区国税局长年与该村结成对子，由税务局领导带头，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深入该

村,认真帮助居民脱贫致富,帮助他们建沼气池,并对使用沼气池情况较好村民的给予了物质奖励。

3.1.3 经济状况

荣山镇 2005 年经济总收入为:21449 万元,其中农业 3635 万,林业 441 万,牧业 3336 万,渔业 15 万,工业 7392 万,建筑业 1165 万,交通运输业 2937 万,商业、饮食业 2022 万,服务业 96 万。人均纯收入 2522 元(数据由荣山镇政府提供)。板桥村由于地处偏僻,收入在其中属于偏下水平,人均纯收只能达到 1000 元左右。而该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基本可分为打工和务农,打工又分为两种,其中一些村民在附近的小煤窑、采石场等打工,而另一些村民则去较远的地方打工。养蚕如今成为该村村民的一种经济补充。

从该村的经济情况看,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生产相对落后,村民的科技应用较差,缺少开拓思路和致富的积极性,因而,经济相对比较贫穷,尚须大力引导发展生产。该村的李书记就说:“信了这么多年教,经济也没搞上去,还是要使劲(努力)抓经济。”主管该教区的潘洪恩神父也说:“宗教在这里的影响很好,这个村的教民都积极过宗教生活,但对科学的接受不行,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

3.1.4 文化教育状况

解放前的 200 多年:在洋神父来大院传教时,同时设立了经书学堂,先教教友识字,为教友扫盲。据说清朝及民国至解放初期的村民都识字,现在八十多岁的老人对经书都能倒背如流,人也特别讲道理,据现任教会副会长冉某称:就连八十多岁的老年妇女也是如此,不仅识字,还明事理,很善于给年轻一些的妇女作榜样,显得“先进、文明”(天主教村教会冉会长语),笔者也亲眼见到了年过八旬的已过世的前任李会长之遗孀,与普通村妇相比她的确显得知书达礼,也倍受其他妇女的尊敬。解放前和解放初,教会经堂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后有在外面当领导的。当时,嫁入本村的妇女中有很多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但这些妇女嫁过来后普遍会跟随其夫家信教,并且开始念经,由此开始识字。可以说解放前的传教士在传播文化、降低本村的文盲率方面的成绩是相当显著的,而且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明清时期,这样的受教育机会对妇女来说也是甚为宝贵的。这种重视文化教育、推崇知书识礼的风气,由宗教传播而形成,而延续,影响久远,至今未衰。

解放后的基本情况:解放后中国政府于 1952 年驱逐了广元的法国神父,后又禁止宗教活动,经书学堂也改为了粮库(为了不被拆毁,村民要求用其存粮,这才保存下来),村民由此开始产生文盲与半文盲,而在这以前大都是从外地嫁入的妇女中有文盲或半文盲。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零分最光荣”的年代里,造成了相对较多的村民不再受教育,也不再重视教育,文盲率大幅上升。

目前的教育情况:村里有一所小学,学制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儿童的启蒙阶段可以在村小学习,以后得到其他地方上四至六年级。村民有的给子女选择和平乡小,有的选择柳桥乡小,甚至有少数还选择了广元市内的小学。很多村民选择直接让子女在其他学校读小学。初中、高中的选

择相对较多,可以去荣山镇中学、附近的乡、镇中学和广元市中学。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毕业后能考上学校的也有一部分坚持升学。现在村子里大学生毕业和在读的共四人,中专生有七人,高中生有二三十人,但更多的孩子因为成绩不太好只能读到初中。现在的村民又普遍都识字了,这与国家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分不开,但也与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令村民恢复了读经、听经、背经,使他们有机会受到宗教方面的教育有关,而家长普遍认同识字、读经的好处,愿意送孩子上学,只要孩子愿意上、成绩也能跟上,他们普遍会支持其升学;并且贫困但成绩优秀的学生还有教会予以支持,这给予一些学生继续学习的机会。现在全村的文盲率是2.3%。教会资助了该村近五十位贫困学生,其中小学生十八名,中学生二十九名,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孤女,今年9岁,其父打工致残,其母(外村人不信教)离婚而去,该女交由其婶娘抚养,其父在新疆一饭馆内洗碗每月包吃住200元,仍坚持寄钱回家让女儿读书,西安教区每年给这位女孩捐款三百元。叶勇神父告诉笔者他们在资助贫困学生时要选择成绩好的。

3.2 宗教信仰在当地的 basic 状况

3.2.1 该村天主教信仰历史沿革

该村的天主堂名为“大院天主堂”。天主教在该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05年(清雍正年间),从1705-1740(清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白日升和巴兄埃二人由陕西来到四川,路经汉中,把该地一个姓李的洗名(即受洗后重新起的名)叫做安德肋的中国年青人带到四川(后称李安德),以后又将其送至泰国的茹地亚,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该地办的培训远东神职人员的修院里读拉丁文,学习哲学和神学。李安德毕业后于1725年授神职,升为神父。回到四川传教达五十年之久。

继李安德后,有法国人博方济、阿拉理和徐德新(又名多林),这三个人分别于1740年、1753年、1775年先后来到四川在广元大院传教。博和徐都升任过四川主教,1815年徐因教案被斩首于成都比较场,从此以后,广元大院有七十八年没有神父,直到1893年林方济被派来后才又有神父传教。

根据林方济的笔记,1860年大院开始建了一处较小的天主堂,林到后又用九十两银子新建了一处教堂。林方济于1899年从杜昂主教处得到2000两银子在横梁子修建麻疯院并在广元置地,并于1901年在小寺山建教堂。于1902年调至南充。

1902年一名法国神父(中文名姓生穆)到小寺山兼任大院教堂职务,后调去重庆。

义和团运动后的半年多时间大院的教友都躲进山洞,事后教友人数也有所增加。

1902年杜昂主教派来一位姓杨的法国神父,他的洗名是玛弟亚。

在他以后的中国神父是德华(原姓王,四川安岳石羊场人),当时因教案平息后教会势力有所抬头(无从考证是什么教案),教友人数大为增加。

德华调走后,中国神父龙安德肋继任,其后教会势力转微,教友逐渐减少。

龙调走后,尹玛尔谷神父到大院任神父达十五年之久,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被土匪抢劫,于广元城内天主堂病逝,由三思诚神父接任大院神父。

1947年世界大战后法国安明如、杜朋、马安德肋、狄峰四位神父先后到广元任神父，其中安、杜二人在广元各教堂的时间最长，直到解放后1952年被驱逐出境。

（以上资料均来源于王良佐《天主教传入广元纪略》，[非出版物]，由广元市天主教会提供）

1948年，著名三治爱国运动推行者、四川爱国会主席王良佐由成都调至大院任神父，1950年被调到广元城内，兼任全县（时为广元县）神父，他在1950年11月30日发起广元500名教徒联名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提出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以自治、自养、自传为中心内容的“三自”新教会。

文革期间宗教活动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和禁止，教堂和神父院均用来做了学堂，五个村的学生都在此学习。1969年学校搬到了和平乡（距村大约五里地的山腰上），神父被抓去劳动改造，从荣山镇调来工作组“破旧立新”，并企图拆毁经书学堂和教堂，因村民强烈要求改作粮仓才作罢，神父院也因被改成了知青的住房而得以保存，院内几人合抱的楠木和樟树都被砍掉，村民群情激愤，想聚众闹事，但最终没有实行，村民的宗教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工作组令各家烧掉十字架、圣物和经书，并要求村民互相揭发进行宗教活动者。在此期间，工作组抓走过一些虔诚的教友和教会的会长。据老一辈村民回忆，一位十分虔诚的任姓女教友因不顾禁令，仍坚持每天念经，工作组来抓她，因为她当时患有骨髓炎，经亲友苦苦求情才未被抓走。当时，村子里也出现了三名（李某、周某、杨某）响应号召反对本教的教徒，带头批斗神父，（周在四清运动时当过十几年贫协主席）。后来李某因二子残废及家庭不和而上吊，另外两名反教的周某及杨某如今成为村里的五保户，都是孤寡老人，杨某漂泊在外靠拾破烂为生，周某则在村里靠低保度日，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充饥。村里人普遍认为斗神父会遭报应。

1982年起国家同意恢复天主教活动，当时大院天主堂并没有专职神父，而是由村民下山将一位成都教区当时在广元市的神父请来，刚到半山腰时，村民就全体出动敲锣打鼓前往迎接，将神父抬上了山，在这里第一次恢复了宗教活动。

1991年，神哲学院毕业的潘洪恩神父被派来做整个广元教区的神父，十几年来他为板桥村通电、通水、修路、修教堂、修澡堂、扶贫、助学、革除陋习等都出了不少力量，深受当地教民喜爱和尊敬。去年起，年仅三十二岁的叶勇神父也分管该村，笔者前去时正遇到他带了三位成都教区的教友前来为教民讲解教义及为小孩补习英语。（历史沿革见表1）

表 1 大院天主教堂及宗教传播历史概况:

阶段	时间	传教人	概况	备注
初起	1705-1740	法国传教士白日升、巴兄埃、中国教士李安德	开始在四川传教，影响及于广元，传教 50 年，影响该村。	
	1740-1860	[法]博方济、阿拉理、徐德新	分别于 1740 年、1753 年、1775 年来该村传教	博方济、徐德新先后任四川主教。1815 年后该村无神父
小天主教堂时期	1860		1860 年修建小天主堂	
大院天主教堂时期	1893	林方济	修建大教堂；成为该教堂神父	结束了 78 年无神父的状态
	1902	生穆	兼任大院教职，教友增加	义和团运动时，各处教案蜂起，大院教友躲进山洞，但其后信教人数增加
建国前期		玛弟亚	大院天主堂神父	
		德华	教友人数大增	
		龙安德勒	教会势力转微，教友减少。	
	1945-1949	尹玛尔谷	任职 15 年	尹遇土匪继而病逝
	1948-1966	三思诚	接任大院天主堂神父	
		王良佐	调任广元县神父，大院天主堂为其辖区。	1950 年发起三自爱国运动，文革时被抓坐牢，传教工作及教友活动受到政治冲击，文革十年宗教活动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和禁止
改革开放时期	1982		恢复教会活动	
	1991-今	潘洪恩、	修葺教堂及重建教堂，为百姓办实事，如助学，筹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	全村总人口的 98% 全部信教
	2005-今	叶勇		

(以上资料均来源于王良佐《天主教传入广元纪略》，[非出版物]，由广元市天主教会提供)

3.2.2 村民信教现状

该村总户数一百九十户中一百八十六户均信仰天主教，占总户数的 98%；全家均不信教的户数为四户，占总户数的 2%；该村总人口为 735 人，信教人数 719 人，占总人口的 98%，不信教总人数为 16 人，占总人口的 2%（见图 1）。信教者中未外出打工者参加宗教活动的情况是：老人和妇女的参与最积极；农闲时参加活动的人数多于农忙时人数；老年人多于年青人。据教民解释这是因为年青人多育有二子女，生活压力较大，所以需要辛苦工作，无法时常参加宗教活动。神

父对该村教民的宗教热情表示满意，用叶神父的话说就是：“教会带动村民的生活，村民信仰活动非常活跃，他们都是主动过宗教生活，不需要神父的催逼。”党员人数为二十人，都是天主教徒，村支书要求他们爱党爱教，不在公开场合下参加教会活动，但可以参加大瞻礼。（注：天主教有四大瞻礼：复活节，四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圣神降临日，5月30日；圣母升天日，8月15日；圣诞节，12月25日）。由于天主教的宗教活动必须由神职人员带领，教徒无法自行举行弥散或瞻礼，而神父又在广元市常驻，并要同时兼顾市区及四县三区其他教堂的宗教活动，所以能到该村的时间十分有限，一年内两位神父平均总共能来四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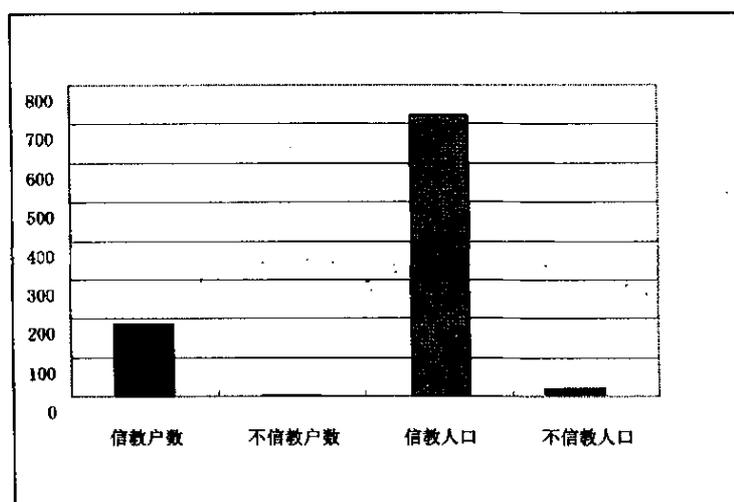


图1 广元市荣山镇板桥村信教与不信教人数及户数比较图

从天主教在该村的传播历史可知：第一，历时比较久远，从1705年至今已200余年；第二，影响深而且广，数代村民几乎全民信教，至今表现出信教户数和人口比重极大。第三，政治性的冲击或禁止，如义和团时期和文革时期的运动并不能摧垮信仰，不能阻绝宗教的影响和传播。第四，该村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并行不悖。作为个案，凸现着正视及研究宗教及其传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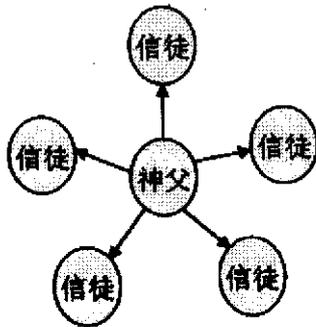
3.2.3 天主教在该村传播的途径、内容、作用与特点

宗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一种很必然的选择，并以其仪式和教规而形成一种社会范式，以其所成就的共同信仰而形成一种社区氛围。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它是传播的主体，而传播则是宗教的手段，二者相互依存，紧密结合在一起。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宗教仪式、宗教活动以及信徒间的关爱、宗教信仰的形成等均离不开传播。显然，它既有社会学的意义，也具有传播学的意义。因此，认识和分析天主教在该村传播的途径、内容、作用与特点，可进一步认识宗教文化作为当地的主流文化对该村和谐发展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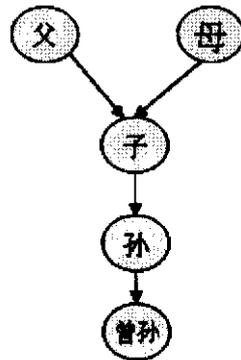
3.2.3.1 该村天主教的传播样式：

在本村的天主教教义、教规的传播过程中，其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为由神父向信徒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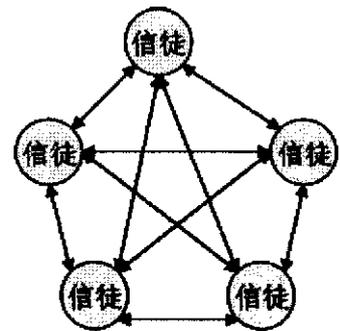
其二为由信教父母向子女传播，其三为教民之间的相互传播。由于天主教严格规定信徒不能够自己解经，故圣经的经义只能由神父向村民讲解，他们在讲道的同时还会宣讲一些天主教教宗的最新指示，这是以神父为中心向信徒传播，这种传播形式为“星型”群体传播，也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见图 A)；由于天主教是一种继承型宗教，信仰天主教的父母往往要求子女也从小受洗并信教，即使是单亲信教的教会也在其结婚时要求其配偶不得干涉其信仰，并要求配偶同意将来子女必须信教，故信教的父母会在孩子幼年就开始向他传播天主教教规及教义，这种传播形式为“Y”形群体传播(见图 B)；由于本村已形成一个信仰大环境，几乎全体村民均为信徒，村民之间互称兄弟姊妹，平时共同生活、劳动，并且经常共同参加宗教活动、宗教仪式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必然会相互影响，并且使一些未能参加弥撒的信徒从这样的传播中接受到信息，并且这种传播的范围会渐渐不断地扩张，延及一些本村附近的信徒或非信徒；这在传播的同时使传播的受众与传播者之间形成一种活跃的互动传播，这种传播则是“所有渠道型传播”(见图 C)，它是满意度最高的传播方式。



图A 星型传播样式



图B Y型传播样式



图C 所有渠道型传播样式

3.2.3.2 该村天主教的传播途径及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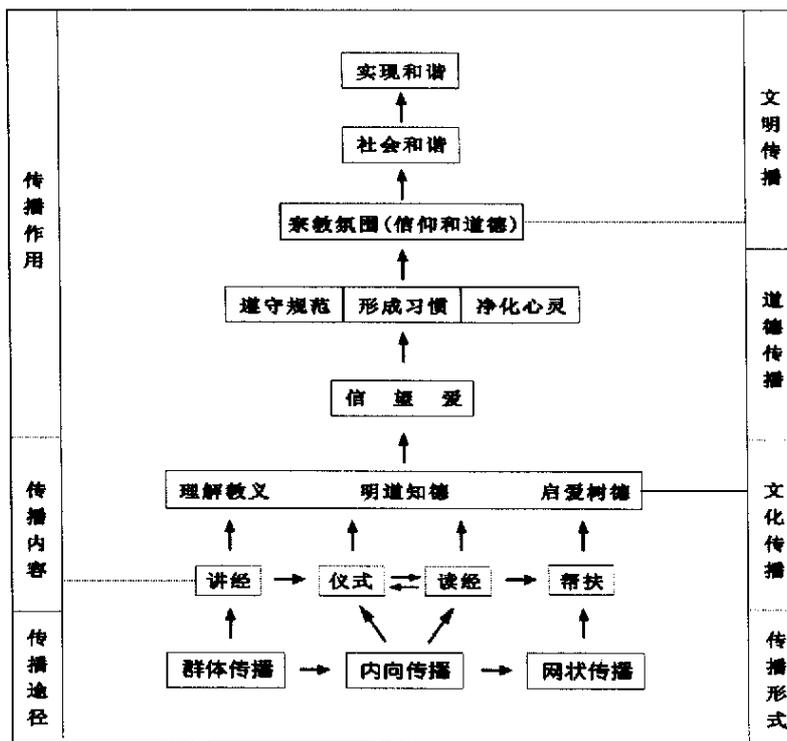
一种信仰在某地要形成一定规模必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接受者本身的原因。根据本社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可知，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受到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方面的影响。当天主教在当地形成信仰环境以后，村民从小就受到教会及信教家长的信仰引导，他们需要为应付环境而习得与信仰相关的行为模式，除直接受到信仰方面的教导以外，他们还间接在观察中学习信仰的外在方式、仪式，并根据一些后果产生出自我评价的反应。这种学习是一种由外到内的传递过程。神父带领信徒进行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以及他所讲的教义教规，被信徒所理解、消化并吸收，这使教义教规、仪式和活动渐渐由一种外在的规定和形式转化为一种信徒内在的意识和感情，可以说，这时天主教才成为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在这时，他们才能自觉地按照天主教教规行事，把神父所讲的教规由内向外表现出来，利用他们所信仰的教义教规来衡量轻重、判断是非、决定自己的行为。当教徒形成一种普遍的宗教是非观和道德观以后，这个地区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道德、舆论的约束力，它与教会的规定结合在一起从内到外地对人形成一种影响力和约束力。这时，就形成了教义教规、仪式活动与信仰及道德之间的互动，二者互相影响，彼此结合，形成

一种社会整合力量，消除人的认识分歧，达到融合统一的状态，促使村民遵守相同的宗教行为规范，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由此看出，宗教传播的作用即由宗教传播带动文化教育，进而推及道德传播，最后推动社区文明，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升华。

举例来说，天主十诫中规定不许人邪淫，神父首先向村民传讲这一教规教义，让他们知道这属于大罪；当信徒吸收到这一信息之后，它渐渐成为信徒的一种道德观，所以当有人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时，信徒会自觉认识到这是犯了“七宗罪”中的一项，他们会自发地对这种行为加以谴责，而如果是信徒自己犯了这种罪，他们也通常会比不信教的人更内疚（当然，得是真正信仰的人），并且由于教规规定凡是犯奸淫的信徒都要受到一定的处罚，这使得犯罪的人会受到教会教规、社会舆论以及自己的良心三重谴责，这就形成了天主教在当地对这一行为的控制。同样，天主教教义所讲的“信、望、爱”也以上述的传播方式影响及净化着本个案，让村民更加彼此相爱。这其实是天主教的“正功能”，也是一种“潜功能”，由此可见，宗教文化的传播影响是该村的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

天主教传播简图



综上所述,可以简单地表述为:

传播形式: 群体传播 (一对众的星型、Y 型传播) → 内向传播 (我们与自己的传播) → 网状传播 (互动的所有渠道型传播)

宗教传播: 口头传播 → 读经 → 信、望、爱
 仪式传播 → 讲经 → 宗教情结

文化教育：识字教育→读经听讲→教义教育→戒律/情感→德行/友爱→和谐人生/社区

道德传播：教义→规范→习性→净化心灵与氛围→社区文明

传播表现：个体参与→群体参与→社区文明

宗教传播→文化教育→道德传播→社区文明→宗教传播。循环往复，不断升华。

天主教教义对教徒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导向，虽然在初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似的潜在影响，但积淀之下，却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和感情，无形中主宰着人们的心灵。虽然该村的社区文明尚属浅层次的，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尚有距离，但其实践和已形成的状态，证明该村天主教传播趋向是引导着安定与和谐。

3.2.3.3 该村天主教传播的特点：

总结上图及表述，天主教传播有着如下特点：1、传播主体的群体性：互为影响，形成氛围。2、传播手段的行动性：众口讲述，尊重仪式，提倡帮扶。3、传播动力的博爱性：虔诚爱上帝，爱心待众生。4、传播内容的人性化：倡导真、善、美，自发求和谐。

3.2.4 天主教教义及其影响

我国儒学和世界几大宗教的教义都教人做人：自我内心的平静和做人准则，家庭和人际、社会关系怎么样相处，人与自然如何融洽。天主教也不例外。在其传播和信徒活动中，都必然地贯穿着这些道理，使信徒们逐渐树立起这种人生理念。各教区教会内部会以教义来规训教民的行为，形成乡规民约似的规范条例。该村就有这样的“教友公约”，贴于神父院堂屋内（这是从广元天主堂买来张贴的）。其内容为：

教友公约（帖子神父院堂屋内）

- 1、早睡早起身体好，起床洗脸人早祷，清除垃圾整理房，绝不佯伴睡懒觉，家庭若离圣堂近，勤望弥撒领主早，一日之计在于晨，万事俱应自主造。
- 2、早夕简单又朴素，饭前祈祷莫忘了。饭后按时去工作，认真踏实不取巧。同事之间讲和气，言语美来态度好，服从调配按规章，团结友爱最为高。
- 3、中午下班十二点，三钟经言莫忘了，隔壁邻舍若有事，互相帮助勤代劳。待人接物要和睦，不讲教友和外教。孩子这间若吵闹，先责自己对人貌。
- 4、家庭理当求和睦，相互信任品为高，夫妇遇事多商讨，宽容理解不吵闹。家长语言更当美，儿女才能更仿效，行动更应合教规，子女不至背后笑。
- 5、朋友近人应相挑，亲近君子避群小，善人君子共患难，仗义疏财德为高，儿童更应慎交友，上当受骗害不小，应效孟母择邻处，勿与小人坏人交。
- 6、舞厅实为地狱门，既坏肉身坏灵魂，男女相抱翩翩舞，天使哭来魔鬼笑，男与女舞妻嫉妒，女与男舞夫不饶，如此家庭更分裂，吵架离婚害不小。
- 7、电影电视应谨慎，黄色录像要严禁，戏剧也应选择看，香花毒草要分明，香花看后更受益，毒草害灵实在误，劝我教友惜时间，光阴丢失永远恨。
- 8、烟中更舍尼古丁，伤气害身实不轻，成年既已成习惯，儿童切莫照样行，醉酒发疯又闹事，伤胃伤身伤别人，醉后阴虚把命丧，灵魂永罚更不轻。
- 9、赌博输赢本不该，危害社会犯诫命，输多赢少家产空，妻怨子恨闹纠纷，偷盗作案不务正，寻死上吊时有闻，对我教友要猛醒，不可染指习上瘾。
- 10、家庭学习要抓紧，每日不误要认真，父母家长要带头，上行下效益无穷，有错更作自我查，知错改错成善行，夜间祈祷最必做，研读圣经一刻钟。
- 11、主日瞻礼应休息，先求天国和义行，积极进堂望弥撒，敬主为先轻世俗，主日更作圣善事，学习圣经看圣书，现世积下圣功德，天堂享福永无穷。

下面是笔者根据从成都教徒处得来的，天主教徒人人必读的《修和圣事》和《慕之道》对十诫的解释以及对罪的理解，为了节省篇幅，笔者对其中的信息进行了综合，相信这些规条对该村村民的约束作用非常强，也可以借此帮助我们理解哪些事是与天主教信仰相违背的，了解对该村的天主教徒起到控制作用的因素。

对天主十诫的解释:

- * 第一诫: 命人恭敬独一的真天主在万有之上, 要有信、望、爱三德。罪包括: 不全心信赖、倚靠和爱慕上主, 求神拜佛、占卜、看相、看掌、信星座、风水、通胜、紫薇斗数、铁板神算、碟仙、通灵等;
- * 第二诫: 勿呼天主圣名, 以发虚誓。罪包括: 不能发假誓、许愿不还, 说反对天主, 指责天主或藐视天主的话。
- * 第三诫: 守瞻礼主日(又叫安息日), 停止个人工作, 进行灵修生活。罪包括: 没有在主日及法定节日(如圣诞节)参与全弥撒, 在弥撒中迟到早退, 主日可以休息, 却坚持去做工, 没有最少每年办一次告解(confession), 没有在复活期领圣体, 没有守教会规定的大小斋期, 没有助教会经费, 没有每日祈祷, 忽视圣经默想。
- * 第四诫: 命儿女要孝敬父母。禁止不服从父母或长上的命令, 忽略对父母、妻子(丈夫)和子女的责任, 不养活年老无能的父母并抱怨他们, 不养育不管教孩子, 给他们立坏榜样, 没有为去世的亲人、恩人祈祷等。主人克扣或迟出工人的薪金。
- * 第五诫: 命人人尊重人的生命, 注重身体健康。人彼此和睦, 彼此帮助, 禁止杀害、损伤自己或别人的肉体或灵魂。不许堕胎或教人堕胎, 醉酒, 吸毒、贩毒、忿怒、嫉妒、说人坏话, 没有尽力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 * 第六诫: 命保守洁德, 重视婚姻和家庭尊严, 说话和行为要维护自己及别人的身心纯洁。反对同居、通奸、重婚、堕胎、人工受孕、同性恋、手淫、看黄色录像等。
- * 侵犯别人的产权, 关怀别人的权益, 不可偷盗、贪污、贿赂、抢劫、使用不标准的度量衡做生意、制假贩假、偷工减料、浪费。有以上行为的应决意补正。
- *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命人诚实维护真理, 尊重别人名声, 不口是心非, 造谣惑众。
- * 第九诫: 禁止贪恋他人的妻女, 要以坚定的意志和祈祷保持身体和心灵的纯洁。
- * 第十诫: 命人知足, 不贪分外之财, 禁止侵夺公家或私人的财物、土地等, 禁止妒忌别人和自我放纵等行为。

上述的 11 条公约以及对十诫的进一步解释在人的生活、思想、行为等方面均有涉及和规范, 在这些教规中, 做人之道、待人之道和处世之道表现得明确、具体。更进一步, 他们非常强调“爱国爱教”, 并给予了明确的内涵。而且把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一致起来, 把爱国与爱教统一起来。这在曾经长期被左的思潮主宰的意识形态来说, 可谓一种大胆却又有利于乡风民俗建设的行径。该村共有党员二十人, 由支部发现、培养, 要求他们“爱国爱教”, 其中爱国包括四点: 1、拥护中国共产党, 接受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2、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协助政府宣传和贯彻党的各项宗教政策; 3、自觉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4、积极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作贡献。爱教的具体内容也有四个方面: 1、努力学习本宗教的基本知识, 教规教义, 积极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和方法; 2、为教会和教友服务, 作出全身心地奉献, 为树立教会新的社会形象而努力; 3、坚持和实行民主办教, 加强内部团结、建立健全教会规章制度; 4、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修行, 密切联系信教群众。(《四川省天主教成都、乐山、西昌教区晋铎庆典专辑》, 第 56 页) 李书记认为一定不能让这个教变为极端, 决不能反国反党, 要以法轮功和一些传销事件为前车之鉴。

3.3 宗教信仰对该村“和谐社会”的影响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阐明了“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政府转型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形势分析会”上把和谐社会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和谐社会以人为中心，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第二，和谐社会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约束来实现的；第三，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定时期公共治理的实现。汪玉凯认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满足以上三个层次的条件。就以上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众所周之，天主教是一个倡导以人为本的宗教，其教义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极深并形成了西方国家普遍的人本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正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不谋而合，能够对社会主义的人本思想在该村的推行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第二，天主教教义在该村有效并积极地约束着教民的行为，这能够有效地支持社会主义法制道德的建设；第三，天主教教义在该村已内化为教民的自觉行动，村民已自觉地尊重并顺服“执政、掌权者”，这将对公共治理的实现起到极大的支持作用。

《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下面就上述这些方面对天主教对该村的影响进行一些叙述与分析：

3.3.1 宗教对民主法治和公平公正方面的影响

由于天主教教义的影响，如天主十诫中的“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窃、毋妄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等诫命，天主教在传播中内化为村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形成强大的教规、舆论及个人良知的三重约束和规范，天主教村二百多年来保持着无犯罪记录，平时村民连小偷小摸的现象也很少出现，因为他们都相信“天主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们能做到克己慎独。据村民介绍，只有在文革期间因有本村青年与下乡知青恋爱而有两位被抓，但这是在特殊年代出现的政治问题，而并非真正的犯罪。从一九九一年以来，该村已连续十四年被评为“治安先进”村，治安的良好状态与天主教教义对村民的外部及内部控制是密不可分的。这一典型性使得本个案显得尤其突出，也是村民最为自豪的一件事。

由于圣经告诫教民要尊重“在位、掌权的”，所以村民能够自觉、积极地响应国家政策，就连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村最难贯彻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且因为天主教明文反对堕胎，认为堕胎与杀人同罪，所以在此村民的堕胎现象很少，村委会没有强制育龄妇女进行定期检查，或命人强行堕胎。计划生育完全建立在村民的自觉行为基础上，因为地处山区，国家政策允许在生育第一胎的四年后生育第二胎，故村民大多都生有二胎，但基本没有第三胎现象。该村是广元市中区的“计划生育先进”村。该村执行党和国家政策方面得到上级肯定，十四年来一直被评为先进村和先进党支部。

3.3.2 宗教对家庭、邻里及其他人际关系方面的影响

天主教的教义教规对家庭和睦有着许多明确的引导和要求，圣经上说“你们作儿女的，要遵

从父母，这是该尽的本份。孝敬你的父母，这是恩许中的第一条诫命；……作父母的，不必对孩子苛求动怒，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示来教育培养他们。”“丈夫要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总是养育它，顾惜它。……作妻子的也要尊重自己的丈夫。”（《圣经》厄弗所书第六章 1-4 节第五章 28、29 节、33 节；）。像这样的经文和圣经故事有很多，都是教导家庭内部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敬妻贤，使家庭更加和睦。就这一点，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一致，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该村的家庭和睦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使该村的家庭关系普遍融洽和睦。根据笔者观察，该村的村民对孩子几乎没有打骂现象，也未发现重男轻女现象，有的村民甚至还对年幼的女儿比对年长的儿子更爱护有加，有时甚至可以称得上溺爱。父母对待儿女比较宽松，在儿女个人的事情上能给他们一定的自由。笔者亲眼见过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有一位女性村民在两位成都教友和笔者面前述说家里现在经济困难，想让刚考上初中，但成绩并不太好的大儿子辍学，而让刚上完小学一年级的女儿继续学业，两位成都教友劝说她让儿子读完初中，再送他进神哲学院去学习，并表示只要她愿意，她们就会资助她儿子读书，这位村民却表示一切都要她儿子自愿，不能强求。两位教友以为她不愿意让家里因儿子当神父而“断了香火”，但她却说如果儿子想当神父她绝不阻拦，如果他不想当，她也绝不勉强，其态度非常开明。

在这个村里，夫妻之间吵闹的事也很少发生，笔者实地调查期间没有见过一次争吵。在访谈中发现，有一位李姓的中年村民，在附近的小煤窑打工，出事故致肩胛骨粉碎性骨折，两年中都无法工作，其父于三年前去世（操办丧事花去大部分积蓄），上有一老母，下有一对儿女需要供养，其妻薛某家务活和地里的农活全部包揽，访谈过程中却没有听她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而且精神面貌也很积极乐观。这样的生活重担压在身上却没有丝毫埋怨之情的确令人惊奇，这位薛某是村里特别会念经的人，她的信仰非常虔诚。而且在笔者与其丈夫的谈话过程中也发现他的心情轻松乐观，完全感觉不到有任何心理负担。

在天主教材村，每个家庭里年老父母的都有儿女照顾（五保户除外），儿女基本上都很孝顺，因为这是天主十诫中的第四诫和第五诫，每个人都要遵守，不遵守的神父和教友都会对其加以谴责。但从文革至 80 年代初没有教会活动期间，有两位老人因子女不孝而上吊自杀（其中一位是前面提及的批斗过神父的李某），之前及之后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而且村民以孝为荣，如有不孝之人就会受到全村人的谴责。

家庭内部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普遍较好，分家等事务都会请会长（如果神父在会请神父）和村中较有地位的教友和亲友前来主持或作见证，分家条款定下来后没有反悔的，相互之间也愿意帮忙。未成年的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也很好，笔者目睹好些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有食共享，有钱同花，表兄弟姐妹之间也能如此。

农村邻里是农村居民在地缘关系的基础上，经久相处，友好往来而自然形成的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程贵铭，1998）。其功能主要有：闲暇时一起娱乐、协调人际关系、文化方面的整合、相互之间的帮助等。“爱邻人”是天主教对信徒的基本要求，圣经要求人“爱近人如同爱自己”，耶稣说：“我的诫命是：你们该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那样”（《圣经》若望福音第十五章 12 节），在这样的引导下，天主教材村的邻里关系非常好，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几乎没有。据冉副会长及李书记介绍，村民之间红脸的事很少，就算偶尔发生，也不会就此记恨对方，总是很快就能和解。同一村的孩子互相关系都很好，经常看见一个孩子拿零食给大伙分食。大一点的女孩愿意帮母亲做家务，帮忙照顾弟妹，也照顾邻里的孩子，孩子在一起时，大孩子很自动的就会照顾或管教小的。

偶尔也有争闹现象，但都总能很快过去。

但是，笔者在对五保户进行访谈时却发现教友对五保户的关爱不多，七十一岁的周某靠每月三十五元的低保生活，每天只能吃一顿饭，神父每年过年的时候会给他送一点钱粮（去年二十元钱，二斤三两肉，十斤大米），而另一位五保户李某则外出拾荒，根本不在村里生活。人们都觉得他们是因为斗神父而罪有应得，所以很少有人主动关心，但还是能和平共处，没有人去欺负他们，一起在经堂听讲时也没有排斥现象。

除了家庭和邻里关系以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天主教村的村民对待本村以外的人的态度。笔者曾参加过天主教村的弥撒，其中一次神父就讲到“友待外方人”这个话题，倡导教徒们友善对待不信教的人和从外面来的人，因为圣经上说以色列的祖先就曾流落到外地，受到外地人的友待而发展成一个大国，所以让教徒们向他们学习。在访谈过程中，很多村民都表示外面的人来此讨饭绝不会饿着。笔者身处此地时也发现当地人非常热情，虽然非亲非故，但特别欢迎我去他们家做客，还特别怕我吃不惯饿着了。前面提到过的薛某死去的公公生前是村里的草药郎中，留下偏方给儿媳，据说十分灵验。但他们替人看病从未主动收过一分钱，用薛某的话说：“如果你不生病，还不会认识我，我不能够因为你有病来收钱嘛！”成都的翻译王老师来的时候摔伤了腿，每天都有女教友自愿前来照料，背她去经堂、给她打水、送饭等等，小孩子也主动帮她干些拧毛巾、倒开水等轻活。为了让王老师早点痊愈，一位村民自愿一大早冒着大雨翻山越岭请来了几十里外二郎庙村专治跌打损伤的草药郎中。笔者在调查期间一直吃住在神父院里，到走的时候去付给冉会长生活费时他却执意不收，后来还是硬塞给他的。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都是笔者亲眼所见，真实感人，让人在这个凡事讲究经济效益的社会里看到了一丝金钱买不来的真诚和质朴。

3.3.3 宗教对乡风文明方面的影响

婚丧嫁娶集中地表现着乡风文明的状态。该村的婚姻风习是：婚姻基本自主，神父和教会认为最好与本教的人结婚，也不排斥教友找外教人，但要求这些人不得影响教友的信仰，并且保证结婚后生育的子女都必须信教。有一个案例是一位本村男性教友娶了外村“散教人”（非信徒），后该夫妇在外打工时丈夫脊柱严重受伤，导致残废（经过五年的时间，现可以行走，却无法干重体力活）。其妻与其离婚将一两岁的女儿带走，该男子之母前去将小孩夺回，认为不能让小孩被不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

婚配方式：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很少有自由恋爱者。以前的教义可能不如现在通融，并且，这一点恰好与中国古代婚配方式相合，故很容易被接受并成为习惯势力。现年七十一岁的五保户周某就因为斗过神父使本村的教徒都不愿意把女儿给他，而他三次想与外教人结婚又被其母阻拦导致一生孤寡。现在，选择结婚对象跟教友及其家人的个人意愿直接相关，教会对此只有引导，没有干预，很多家庭在这方面都比较通融。

由于天主教的教义不赞成离婚，所以该村的离婚率非常之低，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人离婚，都是因为教民娶了不信教的人，对方嫌弃丈夫无钱而要求离婚。

结婚的操办：教会同意教民结婚时请客操办，据说请客最多的人曾在结婚时宴请过全体村民，人们会“随份子”（按人头给钱，但收到礼金后要还礼）。结婚仪式为：首先由神父主婚，神父在主婚时会当众念诵二人的结婚证书，表明对国家法律的尊重，强调该婚姻的合法性；然后，神父

拿出圣经，给在场的人读一些经文，教导新人要互敬互爱，不可离婚。教会规定结婚时可以放鞭炮、喝酒、请客、送礼，但不许用算命用的历书择日。

但是，该村的早婚现象比较严重，二十岁以前结婚的人不少，甚至有三十八岁的外婆，她与其女都在二十岁前结婚生子。这种现象在此并非只有一二例，但也并不普遍。大多数村民还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婚龄结婚。早婚并非天主教所提倡，之所以在这里有所表现，它与经济的不发达、地理位置的封闭、文化生活的简单和慢节奏有关。

由于天主教强调对肉体欲望的克制，而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从一而终”，二者在天主教村紧密结合，在该村已经形成了普遍的贞操观，人们对离婚以及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都非常鄙视。有这样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可以说明。有一位李姓村民，天主教徒，年六十左右，其妻去世以后，他去到山下的两个村庄，分别找了两个相好同时同居，神父知道以后多次找他谈话，说服无果，于是取消了他去经堂做弥撒的资格。同时，村民基本上都对其采取回避的态度，很少有人愿意和他说话，但大家都是用一种和平的态度。这位村民现在很少回村，只有在其妻的祭日才回来和儿孙团聚，家里人倒是不排挤他，仍然表现得很孝顺，但却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

丧葬方面：本地是土葬区，正好与天主教注重土葬的习俗一致，但教会规定教友不许为过世亲友烧纸钱和烧香，可以放鞭炮，可以摆贡果，也可以放鲜花。人亡以后，其家人都要请人念经，为亡灵超度，村里人告诉笔者这是为了让天主教赦免亡者的灵魂。前来念经的人要在其家中吃饭。通常一家人有人去世会花去很多钱请来念经的人吃饭。神父认为只要与信仰无关就可以以尊重中国传统，但只要与信仰有关就只能按天主教的教规办事，所以不许烧纸钱和烧香，也不许用算命历书择日下葬，但却必须为去世的人念经，这既是教会的规定，也已内化为每一个村民的要求，他们把念经一事看得异常重要。每一次请人念经，主人都要杀大概三百斤左右的猪才能请完客，客人一般也会在这时送来一些钱或粮。（死后的周年祭也要念经，而且不只一次）。在访问一位夫家姓李的妇女时，她提到其公公去世后花去了她家所有的存款，猪也杀掉请客了，现在经济情况大不如前，但却认为这钱一定得花，因为这是孝道。笔者前去村子时正好遇上一家人为母亲的周年请人念经，这家主人先请了十来个人在他家吃饭，预定来念经的时间；然后，在8月9日这一天（两天后），由死者的第二个儿子家承办了一次非正式周年祭，笔者前去参加时见有三十六人在他家念经，经堂里分三批人轮流念经（从早上六点至晚上十点），早、中、晚都得为他们提供饭食，在他家吃饭的有神父、修士、成都教友，笔者也在被邀请之列，吃饭的人大大超过了念经的人，大概有六十人左右，坐了9桌。8月12日老大家主持了正式的周年祭，一百多人参加，持续了三天。办了四十六桌席，念经都是分批进去，同时集体诵念。死者一共有四子一女，老大、老二、老三住在一起，家中修起了两层楼的砖房，原来的老房子就在家旁边保留着。老四“倒插门”到荣山镇上一寡妇家，老三在新疆打工，残废又离了婚（即前面所说离婚后其母夺回其女之人），其女由老二媳妇抚养（老二自己也在外打工）。这家唯一的女儿已出嫁，因此，能够为母亲办丧事和周年祭的人只有老大和老二，而很明显长子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和压力，这可能也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成的。

从前村民在有人去世时会有亲人、长辈、神父、会长等一起前往其家中探望，如果死者是有子女的老人，这些人前来主要是要与其子女交谈，对孝顺的进行表扬，有不孝的子女还要予以责打。这个村子的一个风俗是用父母的尸体在家停放的时间来作为衡量儿女是否孝顺的标准之一。后来，因为一对平时很孝顺的子女在长辈死后较快地将其放入棺材，村内人纷纷指责，亲戚中的

长辈在夜里将其责备到两点钟，后来潘神父站出来说：“你们的规矩我不懂，但早一些放进棺材更卫生，应该早放。”这以后，村民就把在家的停放时间改成了三天。

总结起来，村民的婚丧嫁娶有其自身的风俗，也受着教规的影响，凡教会规定的，他们都认真遵守着，只要不被教会反对的，他们也保留着。这些教规和教义对人心的深入影响对当地人婚姻关系和谐、离婚率低、儿女孝顺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些如请人念经导致贫穷的问题却是由天主教的规定产生的，所以教规也导致了一定的问题，应该有所引导，让村民在办丧事的时候量力而行，不要“愚孝”。

3.3.4 宗教对天主教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村容风貌方面的影响

由于天主教村地处山区，饮用水和灌溉水都不足，当潘神父看见这种情况时到处为该村筹款，出资为该村分片区建小水井解决困难。教会还为村民通电资助了两万余元，为该村修路前后资助资助过两万余元（但路况仍然需要大力改善）。可以说教会在对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自从潘神父成为该教会的本堂神父，该村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

由于教会帮助使当地用水问题得到解决，也由于教会的倡导，村里的卫生情况相对于笔者见过的其他贫困农村更好，但村民的卫生程度并不算高。由于笔者前往的时间正在修建天主堂并适逢雨季，所以村容也显得比较凌乱和肮脏。村民的家中陈设大都简陋，即使修了砖房，摆设也很少，有些屋子只用来存放粮食或耕作器具。但教会的厨房以及一些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家庭的厨房都比较干净，有些家庭甚至用雪白的瓷砖做了灶台，也打扫得很干净。神父院中间或有神父和外区教友来往，一般也有虔诚的教友维持清洁，但只在维持状态，实在算不上卫生。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潘神父的倡导和资助下，由村民自己在村子里建起了一个公共澡堂，用煤生火，可以淋浴，村民都在这里洗澡，大大帮助了村民保持个人卫生。

在医疗方面的情况比较差，只要一问村民，就都会说“缺医少药”，很多人生了病没有钱治，或者不舍得花钱治，就等死。很多村民都有头痛头昏的病（估计是高血压），还有很多人有胃病。村里曾有一位草药医生就靠采山上的草药给人治病，最擅长治痔疮，前年去世了，将治痔疮的方法传给了媳妇。还有一位中西医结合医生，平时村民有个小伤小病就去找他，收费比较合理，讲仁义，还可以输液，一盒“先锋”只卖十元。但大一点的病就只能去荣山或广元的正规医院治疗。后面隔座山的庙子山村还有一位专治骨折的草药郎中。前面提到过成都来的翻译坐摩托车上山时扭伤了脚踝，肿胀得十分利害，因连天大雨无法找到汽车下山回城，只得请来这位郎中，来后诊断为脚后跟的软骨骨折，包了草药，收了一百元钱，嘱咐输两天青霉素，并留下了自己电话号码说是三天后不见好转再打电话，他一再声称第三天一定会止痛，消肿，后来翻译因害怕山村的青霉素不正宗，没敢输液。结果是三天中越来越痛，只好决定天晴后去广元或回成都大医院治疗。可见乡村医生的医术还是不敢恭维，村民在这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如果得了什么急病其后果可想而知。

3.3.5 宗教对教友的奉献精神方面的影响

由于天主教教规要求教友常常为教会奉献，并且要关心教会的事，所以该村教友对教会事务的热情都是很高的。因为老教堂太旧又小，村民有心重建，如果被评危房就可能被批准并得到

一笔拨款，副会长冉某自己动手照了很多旧教堂的照片前往有关部门，往返多次以后得到有关部门的同意。向神父提出修教堂的心愿时，当时的主管潘神父说：“粮没有一颗（粒），菜没有一窝（棵），咋个修？”会长和村民说：“这些事都不要你管，你只要同意就行了。”后来教会在全村宣布了这件事，并让村民自觉奉献钱物，当天现金就收到了八千多元，第二天又有人陆续送来了一千多元，捐款共计九千三百四十多元，另有人送猪肉，一共 230 斤，大米一千四百多斤。于是神父找到村委会，由村委会以计工时的形式下达任务，每人计十个工时，小孩和老人的工时由家里的壮年人完成。但还是有一些人每天自愿前来做义务工，不计工时。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年妇人每天前去工地背土、抱砖。打地基的时候有一百四、五十人参加，接近全村人数的 90%。工作时分工明确，一大队的教友负责修路，其他六个队的人修教堂和打地基。2004 年 12 月 26 日（圣诞节后第一天）圣堂开工，从那时起有三位妇女（任某、李某、冉某）为义务修圣堂的工人煮饭。在修建过程中，墙壁倒过一次，当时上面还有两名教友正在砌砖，但掉下来后安然无恙，立刻继续开工（教民都认为是天主的保佑）。村民中最懂建筑的副会长冉某（因为他从前干过一些建筑队的工作）在担任总指挥的同时，凡事亲力亲为，承担了很多危险和艰苦的工作，他在修建时从 3、4 米高的空中跌落（用木架搭建的土吊车上），头部、肘部负伤，请人用药酒擦拭后立刻重新上工；后来他又累昏倒了一次，被教友送到镇医院输液一天两夜，醒来以后拔掉针头就往回跑，回来立刻开工。因为他是最懂行的一位教友，所以一定要他在才能开工。冉会长主持修建工作后，妻子和两个儿子都从精神、劳动和经济上对其大力支持，儿子都捐了相当数量的钱，二儿子回来和其他村民一起干了一些活，妻子主动包揽家里所有的活，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村民为了节省费用，凡是自己能干的都不请建筑队。每天早上七点由冉会长准时敲钟开工。冉会长家住山梁上的六队，每天工作到最晚还要走至少四十分钟的夜路上山，第二天一早再下山。当筹到一万六千元时开始动工，到现在已花费近十万元（笔者前往时已可以使用），还差三万元就可以完工。

笔者到达天主教村的第二天叶神父和成都教友们也到了，从那一天起每天给神父他们送米、菜、水果、肉的人络绎不绝，当时是雨季，连天大雨，很多人用背篋背来，悄悄放下就走，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拿来的。还有一位村民刚抓到一条蛇，也送来请神父吃，另外还有送来狗肉的，村民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都送给神父。神父自豪地对笔者说：“在这里，只要神父来就啥也不缺，送来的吃的神父走了以后都还能吃上很久。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吃好的。”

附：潘洪恩神父发表在《天津天主教网》上的一封求援信：（村民的奉献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尊敬的各位神长、主内兄弟姐妹：

主恩常佑平安。

地处川北崇山峻岭，海拔 1600 米的成都教区大院天主堂，该堂是百年砖木结构建筑，年久失修。今年，洪水冲击造成山林滑坡，教堂地基下沉，已被有关部门列为危险建筑，勒令停止使用。现主日聚会祈祷，只得在露天草坪，为此，二千余山区教友翘首期盼重建圣堂。

大院教会距今有近三百年历史，该堂坐落在广元市中区荣山镇板桥村，天主教教友聚居的院舍中央，故称大院，是川内有名的教友村，辖内教友二千有余，先后法籍和国籍神父十余位驻堂牧灵。经同堂管会成员商定：圣诞节后拆除房屋，利用春节打工回家的青年教友搬土运料，扎基础，进行重建，力争早日竣工。

成都教区在经济困难时刻拨款六万元支援的重建，本堂教友积极性也很高，按户头按人头各显爱主爱教之情之意，其善举令政府官员惊叹不已。但是，我市属于老少边穷的大山区，教友虽具有强烈的爱主爱教的心，但是经济能力有限，仅靠本地教友捐助，实难如期完成圣堂的重建，难以满足二千教友灵性的渴求。作为神父只好为大山区教友们诚心哀求各位神长，主内的兄弟姐妹，望能得到你们的同情与支持。哪怕是一分钱，也是对山区教友的一份爱心。

大院天主堂本堂神父：潘洪恩

3.3.6 宗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的影响

由于《圣经》要求人要“管理全地”，所以天主教认为人对环境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人类应该爱护和保护自然环境。该村的自然环境山清水秀，村民主要居住在环山中的“簸箕”窝内，周边的山涯沟壑里则险峻深幽。历史上森林茂密，鸟兽极多。但近几十年出现人多地少而人与自然争地的问题，传统的“烧荒开地”对植被产生了破坏，特别是大炼钢铁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造成大片秃坡荒岭，山区的雨季常常带来塌方和水土流失，降雨量也有所减少。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越来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实行了封山育林，特别是最近几年还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桑政策。与此同时，教会的神父也大力倡导保护环境，他们在给教民讲道的时候强调了天主将土地委托给人类，大力引导村民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对待环境，不能辜负天主的托付。在教会的引导下，村民看到了退耕还林、还桑的好处，当村委会要求他们退还自己耕地的时候，他们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退耕还林、还桑政策使得天主教村的自然生态得到很大改善，其森林覆盖率达到 48.2%，比上年提高了 1 个百分点。最近，在该村最高的山头上，猴子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这是近二十年来从来未见的现象。退耕还林、还桑政策不仅给生态和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也让村民因此在经济上有所好转。人与动物之间争粮食（野兽破坏庄稼）的现象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特别严重，但这种现象现在已很少发生。该村在国家的倡导下开始发展蚕桑，如今已成为广元市中区的蚕桑大户，有好几百亩桑田，每年给村民带来了平均 200-300 元的收入。

3.3.7 宗教对村民文化生活方面的影响

村民的宗教活动：从 1982 年国家同意恢复大院天主堂宗教活动时起，村民就恢复了一些常规的宗教活动。在神父驻村期间，往往每天给教友“望弥撒”，这时，热心的教友会尽量前来参加。星期天的弥撒比平时更隆重（按规定应是每个星期天望弥撒，但因为神父很少前来，故来的时候天天为教民望弥撒），参加的人数也更多。如果适逢大瞻礼活动该村比过节还热闹，基本上全村所有的教友，包括邻近村庄的教友都会前来参加。如果大瞻礼时神父在广元或其他相对较近的天主堂主持活动，他们就三三两两相约前往参加。村民对大瞻礼非常看重。神父到板桥村时偶尔会带来一些其他教区的知识分子给教友或小孩子补课。调查期间适遇神父带去了三位成都市的教友，其中一对夫妻，丈夫徐某已经七十九岁，是成都市某中学退休生物老师，（从小就是教徒，曾于文革因信仰问题被关押过半年）妻子七十二岁，是成都市防疫站退休医师，他们负责给教友讲一些教规、教义以及梵蒂冈方面的最新精神及新教宗（即教皇）的基本情况，让村民背诵。另一位教友是成都市飞机发动机公司的翻译，因信仰问题被要求提前退休，现年四十七岁，前来为过暑假的孩子补习英语。

村民的娱乐活动：笔者在该村调查的时候发现村民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和打纸牌，问及叶神父对这种现象的看法，他说教会给教友的规定是：第一不能影响生活，第二不能影响身体，第三不能影响工作，在能做到以上三点的基础上可以自己视自己的经济情况打打“小麻将”，如果打得大过自己的经济能力就是犯了天主十诫中的第七诫“不可偷盗”，这就是在犯罪。由于教会的引导，村民打麻将的大小一般从一毛到五毛，也有不打钱的，只以娱乐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教民的家庭和经济稳定。村民另一个打发闲遐时光的主要方式就是看电视，这里大约 80 户人家都买了电视机，其中五十多户人家安有电视卫星接收器，每个电视接收器的安装费用是 412 元，由村民自己支付，一共可收看 84 个台，甚至可以收到外国电视台。没有电视的村民就去别人家看。有的村民和孩子爱在第二天议论前一天收看的电视连续剧，孩子们还爱哼唱电视里的流行歌曲和连续剧主题歌，现在流行的一些如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等网络歌曲都能从他们口中听到。由于教会有严格规定，不允许教民收黄色节目，而且教民也都知道这是不对的，是犯罪，所以这对于村民在收看节目上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帮助。

由这些情况可知：第一，村民对宗教活动非常热心，非常积极，外教区的参与也较多。这成了村民最主要的精神文化活动。第二，村民的娱乐活动单调，主要是看电视和打麻将及纸牌。第三，天主教教义已深入人心，主宰着村民的娱乐活动，给打麻将定的三条规则说明教会的态度是积极的，且是非观很明确。同时，教会对严禁收看黄色电视节目的规定正好约束着教徒的行为。

3.4 本章小结

天主教教义包涵着显著的可以导向和谐的内涵，该村更是表现出其与社会主义政治的谐合一：一是要爱，爱天主，爱教友，爱普世的人，新约圣经中，耶稣就把天主十诫归纳为爱神和爱

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天主，又要爱人如己”。二是重视人的净化，强调人格平等，推崇人的尊严、自由、良心、德行、罪过。三是强调“爱国爱教”相统一，绝不偏废，更不对立，并起到以爱教促爱国的作用；四是强调守法，既遵守天主法，也遵守国法，看重人与社会、法律与恩宠的关系；五是强调奉献和服务精神。如果引导得力，这种教化奠定着一种和谐的精神基础，其影响所及，对于净化慰藉心灵、和谐社区、稳定社会将成为一种推进力。该村的实际情况便是明证。

第四章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4.1.1 天主教在该村的积极作用

4.1.1.1 由于天主教的影响,该村基本形成了人的精神、道德层面的社区和谐

个案显示,该村基本形成了人的精神、道德层面的社区和谐,天主教起到了主导作用,形成了宗教与和谐的依存关系。经过大约 300 年的承传,天主教在此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家庭意识和社区氛围,这就形成了:第一,天主教早已主宰着世代村民们的精神和生活,形成了他们人生的主要内容,并且以这种精神左右着教民的行为;第二,上一代对下一代灌输,从小在特殊环境中的“化”育,是天主教传播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代代传承的主要原因,也是人们信仰的主要外因。

天主教富于典型的人世伦理性。“在信仰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对亲生姊妹的关系。”(奥列斯尼茨基, 1892 年,第 9 页)。“自由地或自愿地执行法规或造物主的意志赋予我们的义务,就叫做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活动。”(赫活斯托夫, 1911 年,第 8 页)。从该村的实际可知,以“十诫”为主要内容的天主教道德观在该村形成了强烈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塑造成个体的人生准则和悠久的社区宗教氛围,人与人之间争斗难见,家庭离异、遗弃少有,刑事犯罪绝迹,村民的是非观强,说明其对人的内心平和、家庭亲和、邻里以至社区和睦,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也是社会的需要。虽然这种和谐,主要表现为由个体到群体的精神状态,对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等方面尚有极大差距,但这已经为进一步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1.1.2 教会在天主教村形成了重视和普及教育的传统

虽然就最初来说教会对教民进行识字教育的目的是读经——传教,但“识字——宗教——伦理道德——文明”却是典型的文化。识字教育和其他文化教育的基础。对比我国众多的农村社区扫盲的艰巨性及“脱盲——返盲”的普遍性,不应低估该村对男女信徒进行平等识字教育的积极意义。现在,教会的神父都受过高等教育,深知受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在该村大力提倡教育,并对此给予了很多实际性的帮助。如资助学校建设,为村小修建门窗和操场花去了三千多元;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继续学业;帮助村民识字;从大城市找来老师辅导村里的学生等。这些实际的帮助使该村形成了一种重视知识和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这里一般只要孩子愿意学习,父母都会给予支持,只要经济允许,村民不会让孩子退学。

4.1.1.3 由于天主教的影响,政策、法规在该村得到遵奉执行。

由于天主教教义教规在当地的影晌，使本村二百多年来没有一例刑事或经济犯罪出现，甚至连小偷小摸也绝迹，使该村多年一直被评为“治安模范村”。村民的是非观念非常强，天主教所恪守的一切教规都在他们头脑里形成了定势，所以对待“罪”，人们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厌恶与远离。“爱国爱教”的观念蔚然成风，使政策、法律在该村得到遵奉执行。在别处被称为“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该村村民却是自觉实施。家庭规模符合计划生育国策下的基本状态。

4.1.1.4 由于天主教的影响，该村没有宗族纷争的现象和对抗国家权威的现象。

对比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的严重的宗族制度和宗族纷争、械斗现象，该村虽是五个大姓并存，却未发生宗族纷争，村民都以教会意义的兄弟姐妹相待，传统宗法文化在此地的负面影响甚微，表现出天主教文化对传统宗法文化的消解作用。村民对神父尊敬并服从如对生父甚至超过生父，却没有因此形成对行政权力的对抗，反而与行政权力互相支持，使宗教与行政事务的实施更加容易。（表现如：由村委会下达任务推动教堂的建设，“你们要尊重在位的和掌权的”这样的宗教教义使国家政策更容易实施等）。（当然，行政危及宗教时，如大跃进到“文革”之禁教，会产生对抗，但这种“地下活动”似地进行宗教活动，也只是消极的对抗而已，在宗教得到行政尊重时，宗教基本上总是支持着行政。）

4.1.1.5 由于天主教的影响，该村的宗教信仰与一些中国传统节庆、仪式得以融合。

中国传统节庆、传统仪式（如婚丧嫁娶），与天主教教义和节庆仪式或者并行不悖，或者融合起来，在这些方面可谓把宗教本土化或中国传统习俗西洋化。以上种种，总体上呈现良性态势；社区、家庭、环境、自然之间，政治与宗教风气之间，都表现出和谐的状态。应该说宗教文化与传播对这种和谐起了主导作用。

4.1.1.6 由于天主教的影响，该村的一些传统陋习得以消除。

对比我国农村较为普遍的重男轻女，甚至歧视、虐待妇女儿童的现象，对比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的大男子主义和家长制，该村却大体做到了男女平等，个别老年妇女还可能受到特殊尊重，一些家庭爱女孩胜过爱男孩。婚丧时的一些迷信或不健康的活动，如以死去的父母在家停放的时间来衡量儿女的孝心等陋习得到禁止或改善。

4.1.2 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该村的生产发展离现代化的要求差距较大，多数村民谈不上生活宽裕，这与经济、教育、科技、地理、交通、信息等方方面面的原因有关，但宗教的负面特质也有一些消极影响，应该给予积极的引导。如：要求信徒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受洗归入天主教，然后让他们从小接受天主教教义的灌输和影响，这对人的自由发展和选择

必然产生负面影响,使其形成一种安于现状、保守、依赖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另外,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教民都认为天主教是一种苦教,他们认为人生在世就是要受苦,做一个天主教徒就是应该苦修,对他们来说,在天堂享永福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理念相对削弱了教民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的积极性,与该村的经济落后有一定的相关。并且,村民在修建教堂时在物质和体力上的付出都远远大于他们建设社区的积极性。在这里,修路、通水、通电都是教会神父去外地筹款,村民自己出力进行,而修建教堂的时候村民却还尽力地给予了经济上的奉献。这种现象,需要教会帮助他们看到建设社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还需要提到的是应该减少该村村民为亡灵念经所付出的大量不必要的支出,特别对死者只有一位独子的家庭来说,这样的负担确实太重。据笔者对天主教的了解和研究,发现天主教会虽然要求信徒为亡灵念经超度,但并未要求他们大摆宴席,这只是当地人的一种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这样的风俗习惯使得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不值得保留,尚需加以引导。

类似的宗教村落,在我国还有很多,而且大多分布在较贫穷落后的地区。需要全面而又深入地研究各种宗教,剖析其正面的、中性的和负面的因素,因势利导地化解问题,强化正面作用,使宗教在农村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4.2 建议与讨论

4.2.1 建议

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只有精神方面的和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同时还应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等物质方面的和谐。这就需要在发展经济上加大力度。而且,由于本个案的特殊性,这些建议不仅是针对村民和村委会,也是针对教会的权威而提出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加强科技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的推广,积极发挥教会对文化教育和科学推广的作用。

科技和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元素,能够在发展经济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故建议该村既能重视基础教育,又能发展科技教育,将二者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村政管理要凸现对科技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引导,如应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学习新的生产技术,不能只因为上级的要求而简单地将一些项目摊派到各农户头上,应大力发挥农民的积极性 and 参与意识。笔者还建议神父及教会会长在加强该村信徒的神学知识和帮助他们学习梵蒂冈精神的同时还能进一步帮助他们加强科技文化以及医疗卫生知识的学习,继续利用天主教人才网络,引进外地的一些有文化或科技知识的天主教徒,进行资源整合,有计划、有针对性、分阶段、分层次地安排这样的人才到该村进行文化科技教育。像这一次笔者在天主教村里遇见的去短期支教的英语翻译就是神父和教友对当地文化教育的一种贡献,这样的活动值得更深入、更长期、更具体地大力举办。比如请来一些中药材专家、林业专家、医务工作人员等对村民进行培训,找到一些信天主教的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前来为该村的孩子补习文化知识。还建议教会继续举办经书学堂,用学习经文的方式普及识字,进一步降低该村的文盲率。

二、因地制宜地促进生产，调整生产结构，结合教会的力量，帮助村民积极投入到生产中来。

该村就是在镇政府的倡导下开展了养蚕业，由于与当地气候、资源相适应，现在该村的这一产业已发展为全镇最好的养蚕大村之一，拥有桑田 400 多亩，每年为村民增加了收入，又特别为老幼妇孺找到了好的创收活动，类似这样的项目应该更多地引进。当地地处山区，中药材在此处易生长存活，建议该村因地制宜地发展中药材、林业等产业，为该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笔者在对村支书进行访谈时发现他对如何发展当地的经济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想为村民修一个小型孵化室，大量生产柴鸡和鸡蛋，并且发展中药材种植。建议村支书能继续在镇政府的领导下，为村民选择良好的创收项目，并且与神父沟通，利用教会的力量找来一些这些方面的天主教徒专家对他的设想进行评估，并筹到足够的经费，再利用神父的威信帮助村民积极投入生产。

三、大力改善当地信息闭塞和交通困难的状态。

当地的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通讯等均处在有待大力发展的状态，山路狭窄颠簸，一到阴雨天就泥泞难行，连摩托车也难以通行，致使该村的信息闭塞，很多山里的像柴鸡、柴鸡蛋、药材、山货等“宝贝”都难以运出山外，给创收带来相当的困难，这一次前来支教的王翻译也因路况太差而摔伤，这对引进外援会起到消极的作用，修路应及早进行。前面笔者已经提到，由于资源有限，村民优先选择了修建教堂，现在大事已了，修路已成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在访谈过程中也知道，村民都表示只要有人出钱，他们都愿意出力自己修路，改善当地的交通状况。前面已经提到教会在十几年中已经陆续为该村修路资助了两万余元，但这只能是一些修补。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提出要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如果政府能够拨款改造当地的路况，相信能够对当地的经济起到相当大的帮助，并且能由此推动该村的其他方面的发展。笔者同时建议教会和神父继续帮助该村筹款，并继续使用与村委会联合给村民记工的方式，在当地修路。该村在通讯方面也有待大力发展，目前全村只有十几户安有电话，宽带网络无法通到该村，教育部所搞的“校校通”也未能到达此地，应该根据这些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变。建议教会筹钱购买电脑和电话，找志愿者进行电脑培训，帮助村民学习使用电脑操作和如何利用电话上网，开始把这样的新事物引进到村中，使村民的眼界更开扩，与外界的联系更广泛，并且通过上网能更好地摄取好的信息，以此推动当地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四、利用电视传媒手段促进村民提高文化生活质量。

由于当地农民的闲暇时间经常用来打纸牌、打麻将，这些时间都没有很好地利用，建议镇政府利用其爱看电视的特点，更多地利用镇有线电视向村民播放生产技术、生态环境、生活常识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节目，帮助村民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并且教会为该村出资八千元安装的“村村通”由于无人管理导致废弃，建议村委会对此加强管理，重新对其加以利用。

五、地方政府应强化移风易俗工作，结合教会消除当地的一些陈规陋习。

破除陈规陋习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道德层面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应加大力度作好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该村来说，由于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一些陋习是与宗教活动相关的，

需要从宗教影响方面给予教育、引导。前面提到过的神父对以父母的尸体停放时间来衡量其孝顺程度这样一种长期形成的陋习, 只经潘神父一句话就改成了停三天, 由此可见, 神父作为该村村民的绝对精神领袖的权威性有多强, 应该利用这样的威望在不改变和影响教规的情况下, 更多地帮助村民消除当地的陈规陋习。如前面提到的为亡灵念经是教会的规定, 但在念经的同时大摆宴席的行为却不是教会的规定, 建议教会的神父和会长对此进行积极引导, 帮助村民看到请客与信仰无关, 只是一种习惯势力, 并且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经济和生活, 进而努力帮助他们消除这种行为的负面作用, 希望可以做到在保留念经的宗教规定的同时, 不需要家属大摆宴席, 不要再让那些有亡者的家庭在精神上失去亲人的同时, 经济和精力上还要遭受巨大损失。

六、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解除农民后顾之忧。

我国的社会保险范围比较狭窄, 长期以来农村人口几乎都没有被纳入保障范围, 这导致他们的人身安全感相对较弱, 很多人怕老怕病, 虽然一些沿海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有效地设立起来, 但在本个案这一问题还亟待解决。前面也提到过由于缺医少药, 该村很多村民病了没有钱治疗, 虽然本来很多病是可以治好的, 却因此导致了一些村民死亡。而对五保户的帮助只靠政府发放的三十五元钱也是不够其基本生活的。虽然在很多方面, 由于天主教网络资源和神父的帮助, 该村的教民所获保障相对于没有教会组织的村落大一点, 但很明显教会的帮助只能是杯水车薪。如果政府能切实加强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养老保险制度, 减少村民的后顾之忧, 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 也能进而提高他们的社会生活质量。

总之, 对该村的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赖于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大力投入与引导, 教会的支持应与政府的工作一致并整合。单靠教会, 其力量是微小的。所以十几年来, 神父东奔西走为当地谋求发展, 虽然有一定的成效, 也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满足了一些实际需要, 但相比之下政府的作用是更大的也是更不可缺少的。一些好的政策和项目都能帮助该村加快发展, 如退耕还林、还桑政策的补贴使村民的经济状况大大改善, 发展养蚕的项目令村民的经济收入有所提高等。政府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在这样的一个全民均有信仰的个案里, 只重视地方政府的权力, 而不考虑宗教组织的功能和作用, 并且不对其作用加以利用的话, 也会造成一些资源浪费甚至激起教民的反感。故地方政府应在新农村建设中考虑如何利用和整合该村宗教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力量, 抑制其消极因素, 正确引导宗教信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加速该村的现代化建设。

4.2.2 讨论

一个异质化的外来宗教, 能在深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统治下的闭塞于深山的村落扎根、传承, 义和团时期毁灭性的“教案”及大跃进进到“文革”的政治禁绝, 都不能使其消亡, 这必然有着深刻的内因和外因, 需要深入研究。但那已经不是本研究内容, 而当另作专题研究。

基督教在西方对其科学文化的促进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至今, 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浓

郁的宗教氛围中科技、经济都进行着良性发展。宗教改革帮助他们思想自由的实现，经院哲学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并为科学铺平了道路。（陈荣富，1987，第510-511页）并且，最初利玛窦、南怀仁等来到中国，都是以先进的科学仪器甚至武器打开的传道之门，但是，为什么在该村却没有表现出对先进技术的渴望，并得到经济科技的良性发展呢？在近300年的宗教传播中，该地的经济一直不富裕，当地人也一直相对保守、依赖、安于现状，是农业文明的必然，还是一种民族习性使然？这样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宗教与政权的关系，在我国有着倾向明显的两种表现，一是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显示着这种关系是双边的共同需要；二是教会活动的政治领先倾向，政治性话语或领导人讲话往往成为神职人员在宗教活动中的开场白或习惯用语，并以之与教义互释，显示出神职人员政治化或官员化。但该个案的实际状况却表明：第一，教徒们尊重政权及其代表人，因为圣经告诫教民要尊重“在位掌权的”；因为这种尊重，便奉行政权的政策法规。这与“领导、被领导”相距颇大，前者是自主的、平等的，而后者是人为规定的有等级的。第二，政策或政治性话语，凡与教义相合的，如守法、禁黄等，很容易在此得到遵行，而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运动，在该村却相对平淡，参与的人少，特别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当地只能先靠从外面调来红卫兵和工作组才能进行，从始到终本村教民参与的人并不多，并且大部分人都努力保护着教堂和神父堂，信徒在国家不允许宗教活动的情况下转入了地下活动，在与政策法规与宗教教义相悖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消极地违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实际，引发着我们的深思：政权应该怎样面对宗教对它的尊重？应该给予宗教怎样的地位？怎样帮助和推进类似的村落提升物质文明，走向现代化？

该村表现出人的精神、道德层面的社区和谐，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精神文明，表明精神文明可以在物质文明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态下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现时的一些社会认识和主流观念是否合理就需要认真的反思了。

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 基督教文化面面观. 齐鲁书社, 山东: 1991: 114
- [2]陈麟书, 袁亚愚. 宗教社会学通论. 四川: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13~19
- [3]孙庆忠. 论杨庆堃先生的中国宗教观. 中山大学学报, 2001, 4
- [4]王铭铭. 中国民间宗教: 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 世界宗教研究, 1996, 2: 125~134
- [5]张志刚. 宗教学是什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6]张兴杰. 现代社会学.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 [7]尕藏才旦. 宗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宗教, 2004, 3
- [8]尚九玉. 宗教人生哲学思想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9]来建础. 城市老龄化与宗教的心理慰藉作用. 宗教问题探索 (吴孟庆, 罗伟虹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 [10]戴康生, 彭耀. 宗教社会学.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22~329
- [11]顾卫民. 基督徒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12]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3]梁家麟.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 香港: 香港建道神学院, 1999
- [14]侯杰, 范丽珠. 中国民众宗教意识.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 [15]闭伟宁. 改革开放与基督教在我国沿海农村的变迁——基督教在斜桥镇发展状况调查与思考.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5
- [16]赵卫东. 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兰州学刊, 2004, 6
- [17]箫志恬. 当代宗教问题的思考. 上海: 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 1994, 73、164
- [18]林春雨. 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及方式——以汕头市盐灶乡为个案.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3, 第19卷增刊
- [19]陆芸. 泉州的宗教文化特点.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2004, 3
- [20]宋清华. 一些农村宗教活动产生的原因.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0, 3
- [21]傅国钧. 基督教发展问题的典型调查与思考.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2, 4
- [22]姚米佳, 王剑华等. 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地区基督教传播速度加快原因分析.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2003, 3
- [23]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24]吕红平. 家庭问题与现代化. 河北: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 [25]王思斌. 社会学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75~276
- [26]特里. 甘布尔. 有效传播.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69
- [27]程贵铭. 农村社会学. 北京: 中国农大出版社, 1998, 129
- [28]奥列斯尼茨基. 道德神学或基督教关于道德的学说. 1892, 9 (转摘自陈荣富. 比

较宗教学. 北京: 中国文化书院, 1987, 430)

[29]赫活斯托夫. 伦理学和社会学纲要. 道德的个人和社会. 1911, 8 (转摘自陈荣富. 比较宗教学. 北京: 中国文化书院, 1987, 430)

[30]陈荣富. 比较宗教学. 北京: 中国文化书院, 1987, 510~511

致 谢

本论文是在谭英副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一年多来，无论是在论文选题、经费支持，还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谭老师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对研究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给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令我终身受益。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诚挚感谢所调查地区四川省广元市荣山镇板桥村协助调研的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也感谢所有接受调研的天主教村村民，还要感谢广元市天主教堂的潘洪恩、叶勇神父及黄老师（教堂职员）以及成都教区的教友提供文献资料及天主教村一些有关基本情况。

感谢朱启臻教授、孙庆忠老师在授业时给予本论文的启发和帮助。感谢赵旭东老师提出的宝贵的修改意见。

最后，谨对所有关心、帮助我的家人、老师和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附录

附录 1: 部分调查照片

居民的住房



村里孩子英语辅导课后（新天主教堂内）



办小型周年祭时请客场景



周年祭念经场面



村后的风景



通往村庄的路



弥撒场景



教会的厨房及自愿工



未竣工的教堂



教友培训



新教堂



村庄地貌



新教堂远景



教会资助修建的自来水设施



附录 2 访谈结果要录:

很多教友对信教有着很自身的体会。在这方面,笔者调查了几十个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村民,他们有着共同的信教理念,经过整理和总结兹摘录几例有代表性的话语,表现他们共同的心声。

村支书: 信教是心灵上的安慰,人有了病还是要尊重科学,天下教友一家,没有斗争,讨饭的人走到这里不会挨饿,但是宗教不按政策法规就容易变成极端。

村民李: 天主的道理好,懂得了天主的道理人就不犯罪了,所以我们这里的人不偷不抢。

村民任: 信教的好处多,灵魂不用下炼狱受苦。人在世上只有几十年最多一百年,但死后灵魂不生不灭,只要人领了洗(受洗礼)就可以让不生不灭的灵魂在天堂上享永福,其实这个教是个“苦教”,人要多行善,做善工,每天念三次经不容易,但为了灵魂享福也值得,“散教人”(不信本教者)很可怜,灵魂要在炼狱里被火烧。

村民李: 信了后觉得心灵上有平安喜乐,从前不懂太多天主的道理,对过宗教生活也不是很热心,后来生活上受了挫折就常常进圣堂听道理,从闷闷不乐变得喜乐了,每次一到经堂就很愉快,一切不高兴的事都可以不去想了,我觉得天主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跟他的关系很亲。

村民薛: 我觉得信这个教好,天主会保佑,我们全家去新疆打工的时候,走之前我花了四元钱买了个平安符求天主保佑我们一家出门平安,结果在新疆建设兵团投靠亲戚的时候,亲戚很帮忙给我们两口子都找了工作,给两个娃娃也找了地方读书,天主就是保佑了我们。

村民田: 信这个教走到哪里教友见面都很亲。我们一家去天津打工的时候,我们的主任也是教友,一认识就成了朋友,她借经书给我们看,后来快过圣诞节了,她晚上就带我们去天津的教堂过了圣诞节,大瞻礼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念经。

小孩 1: 天主教好,当散教人不好,我婆婆说好,我也不晓得为啥好。

小孩 2: 天主教好,我也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求天主帮助,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神父来了的时候特别闹热,好耍。

附录3 教民每日诵念的玫瑰经

玫瑰经奥绩（神绩）

欢喜一端：天使向圣母玛利亚报喜

欢喜二端：圣母拜访圣妇依撒伯尔

欢喜三端：耶稣诞生

欢喜四端：圣母献耶稣于圣殿

欢喜五端：耶稣十二龄讲道

痛苦一端：耶稣山园祈祷

痛苦二端：耶稣受鞭打苦刑

痛苦三端：耶稣受茨冠的苦辱

痛苦四端：耶稣背十字架上山

痛苦五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荣福一端：耶稣复活

荣福二端：耶稣升天

荣福三端：圣神降临

荣福四端：圣母蒙召升天

荣福五端：天主立圣母为天地之元后及世人之主保

光明一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光明二端：耶稣参加加纳婚宴

光明三端：耶稣宣讲天国福音

光明四端：耶稣大博山显圣容

光明五端：耶稣建立圣体圣事

经文（白话文版）

圣号经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信经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孕，由童贞玛利亚诞生；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天降下，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我

信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

天主经

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圣母经

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

圣三光荣经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法蒂玛圣母祷词

吾主耶稣，请宽恕我们的罪过，助我们免地狱永火，求你把众人的灵魂，特别是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

又圣母经

母后万福！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厄娃子孙，在此尘世，向你哀呼。在这涕泣之谷，向你叹息哭求。我们的主保，求你回顾，怜视我们，一旦流亡期满，使我们得见你的圣子，万民称颂的耶稣。童贞玛利亚。你是宽仁的、慈悲的、甘饴的。天主圣母，请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堪受基督的恩许。

诵念玫瑰经的方法

1. 划十字圣号，念信经。
2. 念一遍“天主经”。
3. 念三遍“圣母经”。
4. 念一遍“圣三光荣经”。
5. 念第一端玫瑰经的奥绩，续念一遍“天主经”。
6. 再念十遍“圣母经”，并默想该端玫瑰经的奥绩。
7. 念一遍“圣三光荣经”。
8. 念一遍“法蒂玛圣母祷词”。
9. 念第二端玫瑰经的奥绩：念一遍“天主经”，并重复6、7、8项。依此法接续念第三端、第四端及第五端玫瑰经奥绩。
10. 念完第五端玫瑰经，念“又圣母经”。

11. 通常星期一、六默想欢喜奥绩；星期二、五默想痛苦奥绩；星期三、日默想荣福奥绩；星期四默想光明奥绩；但星期日也可按教会节日而选念适合的玫瑰经奥绩。亦可每日自由选择念欢喜、痛苦、荣福、光明五端或念全部二十端。

附录 4 教会教规

七件圣事

圣事是主耶稣亲自立的有形礼节，为表明并赋圣宠给领圣事的人。

圣事有七件即：

- 1、圣洗（领洗）：赋予人超性的生命，是重生的圣事。
- 2、坚振：使人的超性生命成长壮大，在圣神内作基督见证的圣事。
- 3、圣体：滋养人的超性生命，作人超性生命的神粮与基督结合的圣事。
（以上为入门圣事）
- 4、告解：医疗人超性生命所犯的罪恶。
- 5、终传：在人病重时赋予人心灵平安，减轻人之病苦或准备人灵去见天主。
（以上为康复圣事）
- 6、圣秩：赋神权给神职人员，俾能为教会教友服务。
- 7、婚配：赋予夫妻恩爱及生养教育儿女之恩，分享天主创造新生命之权，圣化夫妇。
（以上为建设延缓教会的圣事）

修和圣事

告解的五条主要规矩：

- 1、省察：求圣神光照，按圣经、十诫、圣教会四规及七宗罪等，用心查考自己从领洗或上次告解以来，所犯过的罪。
- 2、痛悔：悔恨自己得罪天主。
- 3、定改：立定志向，从今以后不敢再犯罪。
- 4、告明：（在神父面前做）向神父说出所犯过的罪及次数。
- 5、补赎：神父按罪的轻重给与的神功，可以是经文或其他善行，一定要照着做的。

圣教会四规

- 1、凡主日及一总停工瞻礼之日，该参与全弥撒。
- 2、遵守圣教会所定大小斋期。
- 3、该妥当告解，并善领圣体，至少每年一次。
- 4、当尽力帮助圣教会的经费。

七宗罪

骄傲、悭吝、迷色、忿怒、嫉妒、贪饕、懒惰。

个人简历

姓名	苏珊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3-10-29
学号	S041235		专业	英语	
毕业院校	四川大学		籍贯	四川	
研究方向	传播社会学				
个人基本情况	1994年起开始工作,考于中国农大前于美国视博恩(慈善公司)北京办事处担任翻译及总经理助理一职,在该公司期间开始接触社会慈善工作项目,并由此选择在农大学习社会学。				
论文情况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收录类别	发表年月	总期数	备注
△略论传统伦理道德的发展规律和历史命运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	一级期刊	2004年,(2期)	81	
△略论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内涵特征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	一级期刊	2004年,(3期)	82	
△改革开放和中国农村的婚姻家庭变化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	一级期刊	2005年,(1期)	84	
△农村发展的着力点:以信息化创新推广传播体第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	一级期刊	2005,第4期,季刊,	87	
△农村推广体系与信息化建设的创新举措	现代远程教育 与农村发展	其它刊物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第11卷	合作